

抒情的兩種政治

——陳世驥與保釣運動*

楊 婕**

摘 要

追索陳世驥1971年正式提出抒情傳統的背景，適逢保釣運動的巔峰。其所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正是釣運左翼重鎮，陳世驥身為柏克萊保釣作家劉大任、郭松棻和李渝等人的老師，負責調停學生與國民黨政府間的衝突。以保釣為問題意識，重探陳世驥對抒情話語的倡議及其身殉，未嘗不可理解為「抒情」與「革命」（紅色抒情）在七〇年代海外語境下的辯證：如果反共是離散一代知識分子的課題，北美釣運左傾潮流則對此一認同狀態構成挑戰。這使得抒情傳統的提出時機，提供了極具象徵意義的歷史暗示——透過「創造抒情」，構成「超越革命」的呼召。

唯在革命的美學範式中，其從前現代中國孵育的抒情想像，被視為右翼反動語言來理解。陳世驥在報端的公開表態，更使之淪為釣運左翼的攻訐對象。從拜師到叛師，成就了革命，也埋下後半生的漫長追悔。爰此，柏克萊保釣作家在後期的文學書寫中對陳世驥形象的再現，與他們對運動的省思互為表裡。當他們書寫陳世驥，其實（未必自覺地）以抒情作為方法，解構昔年的革命神話，藉由對抒情的兩種政治之重省與應答，為恩師完成遲來的平反。

2022年4月17日收稿，2023年11月5日修訂完成，2024年1月25日通過刊登。

* 本文初稿承蒙梅家玲教授、王智明教授悉心指正，以及陳國球教授慷慨惠賜陳世驥先生1948年的文章“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送審過程中，復蒙匿名審查人提供諸多寶貴意見，使本文得以據此修訂、增補。謹在此深致謝忱。

** 作者係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

關鍵詞：陳世驥、柏克萊保釣作家、抒情傳統、紅色抒情、劉大任、郭松棻、張系國

一、前言

陳世驥（1912-1971），生於河北，1935 年自北京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畢業，1941 年赴美，1945 年入職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進入柏克萊後，陳世驥長期擔任東方語文學系系主任，協助籌建比較文學系和現代中國研究所，充實東方圖書館館藏，並主持 1957 年設立的「中國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奠定柏克萊的中國研究基礎。¹1971 年發表〈論中國抒情傳統〉一文，為現代中文學界標示出重要的論述方向。

不過，迄今鮮有論者注意到，陳世驥與七〇年代北美保釣運動饒有淵源。陳世驥是文學史上赫赫有名的「柏克萊保釣作家」——劉大任（1939-）、郭松棻（1938-2005）、李渝（1944-2014）等人的共同老師，²劉、郭身為海外釣運左翼領袖，³對保釣運動的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⁴

考察陳世驥於 1971 年提出抒情傳統的時間點，正值北美釣運的巔峰。陳世驥赴美後對抒情話語的建構固然源遠流長，然以保釣為問題意識，重新檢視其於七〇年代初對抒情話語的倡議，未嘗不可視為「抒情」

1 陳國球，〈陳世驥論中國文學——通往「抒情傳統論」之路〉，《漢學研究》29.2(2011.6): 225-244；張研田，〈陳世驥與司卡拉匹諾——跋司卡拉匹諾：陳世驥先生事略〉，《幼獅月刊》41.1(1975.1): 42-43；史誠之，〈桃李成蹊南山皓——悼陳世驥教授〉，收入張暉編，《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陳世驥古典文學論集》（北京：三聯書店，2015），頁 380。

2 下文會再談及，郭是陳世驥的指導學生。劉、李雖非文學專業，亦多受陳世驥的幫助。

3 七〇年代北美保釣運動的意識型態並非定於一尊，主要分為左翼、中間派、右翼三種路線。左翼支持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中間派又可分為中間偏左、中間偏右等維度，整體上反對過激的行動，以體制內改革為主要訴求，在革新保臺的立場上與右翼有所交集；右翼則是國民黨政府的支持者，與其部署的海外勢力緊密掛鉤。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即屬左翼重鎮。

4 相對於劉、郭的領袖角色，李渝較未涉入第一線示威抗爭，主要投入由保釣所衍生的左翼文藝運動，參與保釣刊物的編輯與供稿、主導話劇《日出》演出等。

與「革命」（紅色抒情）⁵在海外語境下的辯證：如果「反共」是離散一代知識分子的課題，北美釣運的左傾潮流則對此一認同狀態構成挑戰。

識者已指出陳世驥赴美後對抒情傳統的建構帶有民族主義動機，⁶他對抒情話語的提倡，不無顯現其作為抒情現代性實踐主體，迂迴回應歷史格局的姿態；而劉大任等人對陳世驥從留學初期的親近到叛離，應合他們拋卻傳統詩教，受到左翼浪漫主義召喚的轉折。在這樣的脈絡下，陳世驥對抒情傳統的詮釋，與社會主義的新中國論述形成微妙的對位。

爰此，本文聚焦於陳世驥和保釣運動的歷史淵源，探討箇中所涉及兩種抒情的政治之對話，與對峙。

與本文相關的前行研究部分，陳國球於〈原詩原興：陳世驥〉一文率先指出：

我們知道陳世驥逝世前不久，北美「保釣」浪潮方發，他任職的加州柏克萊大學是旅美華人抗議示威的主要場域；國族文化認同的起伏變化以及時世推移，種種悲懷莫遣，可能盡壓在陳世驥莊嚴肅穆的文章紙背之下。於是，陳世驥窮究「詩」與「時」的源起、回溯中國文化的「尚文」與「抒情」的精神，自有其考掘文史知識以外的意義。⁷

陳國球雖未對這一點詳加析論，已為後繼者探究陳世驥及其抒情話語和釣運的歷史因緣首開端緒；鍾秩維〈行動中的藝術家——李渝文學的當代性〉（2016）透過「本真性」（authenticity）和「民族主義」接引保釣運動與抒情傳統的可溝通性／可連結性，在理論視域上對本文頗具啟發性；⁸黃資婷〈論李渝小說中憂鬱與抒情之力量〉（2015）指出李渝的憂鬱話

5 這個詞彙是由王德威所提出。詳見本文第三節的討論。

6 陳國球奠定學界從民族主義和離散語境介入陳世驥的抒情論述之基礎，後續王德威、黃錦樹、鍾秩維皆有精彩發揮。陳國球，〈「抒情傳統論」以前——陳世驥早期文學論初探〉，《淡江中文學報》18(2008.6): 225-251。

7 陳國球，〈原詩原興：陳世驥〉，《抒情中國論》（香港：三聯書店，2013），頁 86-87。

8 鍾秩維，〈行動中的藝術家——李渝文學的當代性〉，收入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所編，《「論寫作：郭松棻與李渝文學研討會」會議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2016），頁 149-169。承蒙鍾秩維同意引用，深致謝忱。

語，承繼陳世驥經過西方文論洗禮後重塑中國抒情傳統的道路；⁹ 黃衍智〈歷史暴力與抒情的日常——論郭松棻的「詠史」〉（2021）認為陳世驥對古典文學審美精神的發掘與郭松棻對中國近代史的探尋，在時間想像上有相通之處。¹⁰ 黃資婷、黃衍智的觀察各具洞見，唯二文並未對此加以發揮。

以下擬由四個面向展開論述：首先，柏克萊保釣作家赴美初期與陳世驥關係為何，在革命前夕鋪墊出什麼樣的互動模式與對話背景？再者，陳世驥的離散歷程，如何形塑以「情」為關鍵字的家國詩學，又在何種意義上與釣運左翼的紅色抒情美學產生辯證？其次，陳世驥在運動中扮演的角色，與其在左翼論述中被再現的位置，如何見證兩代知識分子在七〇年代歷史關口之扞格？最後，本文考察柏克萊保釣作家在文學書寫中對陳世驥形象的重塑，探討他們如何以創作作為另一種抒情的技藝，省思革命。

二、「陳公門下行走」：釣運前夕的群體形構

柏克萊保釣作家於 1966、1967 年間先後赴美留學之際，¹¹ 陳世驥已是柏克萊極具威望的學者，劉大任這麼描述其學術地位：

陳世驥那時候一言九鼎，在中國研究這方面，包括東方語文系、政治系、社會系、歷史系，這幾個系重要的教授都是他的學生。他是頂尖人物，地位相當高。¹²

初來乍到的留學生們，遂受到陳世驥的多重庇蔭：郭松棻因陳世驥邀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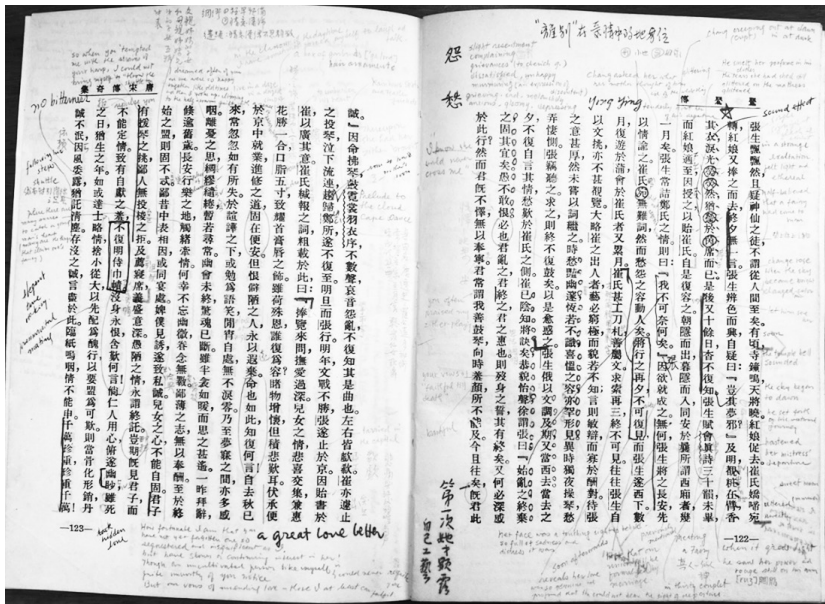
9 黃資婷，〈論李渝小說中憂鬱與抒情之力量〉，收入（美）Robin Visser、樂鋼編，《東亞人文·2015 年卷》（臺北：獨立作家，2015），頁 88。

10 黃衍智，〈歷史暴力與抒情的日常——論郭松棻的「詠史」〉，《中國文學研究》51（2021.2）：257-299。

11 劉大任、李渝於 1966 年入讀柏克萊，劉主修比較政治，李主修視覺藝術創作。郭松棻 1966 年進入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攻讀英國文學，1967 年轉至柏克萊分校攻讀比較文學碩士。

12 《南方周末》，〈專訪作家劉大任：「小說要有意義，先回到現實社會裡來」〉，《南方周末》「每日頭條」網站，2018.8.20，<https://kknews.cc/zh-tw/news/pgb4vvj.html>（2022.1.7 上網檢索）。

由聖塔芭芭拉轉學柏克萊，拜入其門下；劉大任由陳世驥引介進入中國研究中心工讀；¹³ 李渝經陳世驥建議轉入藝術史學系。¹⁴ 出身外文系的郭松棻回憶，在陳世驥課堂上，他才開始有系統地研讀古典文學，接觸唐傳奇、唐詩。¹⁵ 考量到有外國學生參與課程，部分選讀材料較為淺易，陳世驥要求他們在課前先完成英譯，採用新批評方法進行文本細讀。¹⁶（如圖一）



圖一 郭松棻修習陳世驥課程筆記：〈鶯鶯傳〉¹⁷

陳世驥對這批留學生的照顧，並不僅止於知識傳授或解決經濟問題的

- 13 劉大任，〈兩張老照片〉，《晚晴》（臺北：印刻出版社，2007），頁 48。
- 14 梅家玲、鍾秩維、楊富岡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18：李渝》（臺南：臺灣文學館，2019），頁 50。
- 15 舞鶴訪談，李渝整理，〈不為何為誰而寫——在紐約訪談郭松棻〉，《印刻文學生活誌》1.11(2005.7): 47。
- 16 簡義明，「書寫郭松棻：一個沒有位置和定義的寫作者」（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7），頁 154。
- 17 魯迅校錄，《唐宋傳奇集》（香港：新藝出版社，1967），頁 122-123。

層面，更以其在柏克萊的影響力，幫助他們通過學位資格考試。劉大任、郭松棻皆提及陳世驥在他們的資格考中發揮的「作用」：劉大任於 1970 年春舉行資格考，口試委員對劉大任的研究頗不滿意，陳世驥打斷論辯，要劉大任分析郭沫若《十批判書》跟中共二戰後反蔣理論的關係——這正是兩週前劉大任在陳世驥寓所聚會的發言內容；¹⁸ 郭松棻的資格考則在鈞運初期舉行，須考四門語言，法文科的考試材料顯然經過「安排」，指定郭松棻翻譯陳世驥的論文。¹⁹

從比較實際的層面來看，陳世驥對學生輩的照顧，可能與更長遠的職涯規劃有關。根據劉大任的說法，陳世驥為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的內定人選，²⁰ 鈞運發生前，計畫帶這批臺灣學生赴港辦校：

陳世驥照顧這批人有一個目的。那時候的香港中文大學，早期是由美國資助建立起來的，第一任校長是從加州伯克利大學本部派去的生物教授，當時內定陳世驥接第二任或第三任的校長，他要準備自己的幹部和人馬，他就照顧了我們一批年輕的、台灣來的留學生，準備帶到香港去。我們把學位念完了就跟他一起去，負責把那個學校搞起來，我原來的事業規劃是準備這樣走的。²¹

18 劉大任，〈柏克萊那幾年〉，收入北美洲華文作家協會編，《縱橫北美——從花果飄零到落地生根》（臺北：秀威資訊，2018），頁 68。

19 簡義明，「書寫郭松棻：一個沒有位置和定義的寫作者」，頁 147。

20 依據夏濟安、夏志清通信內容，陳世驥從 1964 年便介入柏克萊與香港中文大學的合作計畫，唐文標、楊聯陞亦提到，陳世驥 1970 年曾為香港中文大學「考試及課程事宜」赴港。不過，陳世驥是否準備出任香港方面的職務，史誠之對此事的記載則有出入。史誠之指出，香港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希望陳世驥接任院長，陳世驥二度推辭，認為若受到公事掣肘，反而難以提供協助。綜合這些資料來看，陳世驥與香港方面的合作確有其事，然受邀學校與職銜為何、是否有意赴任，存在不同說法。王洞主編，季進編注，《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卷五（1962-1965）》（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9），頁 543；唐文標，〈斷竹·續竹·飛土·逐穴〉，《唐文標碎雜》（臺北：遠景出版社，1976），頁 153；楊聯陞，〈追懷石湘——陳世驥選集序〉，《傳記文學》19.6(1971.11): 18；史誠之，〈桃李成蹊南山皓——悼陳世驥教授〉，頁 391-392。

21 《南方周末》，〈專訪作家劉大任：「小說要有意義，先回到現實社會裡來」〉。按：香港中文大學第一任校長並非生物教授，而是專攻工商管理學的李卓敏。

考察香港中文大學的成立，與冷戰結構密不可分。依據美國文化冷戰戰略思維，復興中華文化價值觀有利於抗衡共產思想，唯傳統東南亞華人高等教育多以中國大陸為留學地點，另尋境外地點，建立中文高等教育體系有其迫切性。1963年亞洲基金會、孟氏委員會支持成立香港中文大學，²²即是此一歷史架構的產物。

置於冷戰形勢下觀察，陳世驥的影響力足堪玩味。陳世驥不僅主持柏克萊中國研究中心，兼任美國各大學中國語文聯合研習所（Inter-University Program for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簡稱史丹福中心）董事，又被納入亞洲基金會在香港的高等教育規劃，亦曾受國民黨邀請擔任國策顧問（陳世驥予以婉拒）、²³被列入「反共建國聯盟」擬邀名單等，²⁴顯見其在美國與「自由中國」合作藍圖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從這個視角觀察，陳世驥與柏克萊保釣作家的互動，或許難以純粹的師生之誼衡量。然人情與世情本非單一的因果邏輯，並且，從學生輩的憶述可看出，此一階段陳世驥和他們的交往，尚未涉及太多實務規劃，以藝文性聚會為主要基調。

陳世驥的寓所位於灣區東岸的柏克萊丘陵地，雅稱「六松山莊」。彼時的柏克萊人才濟濟，劉大任、郭松棻、李渝、張系國（1944-）、楊牧（1940-2020）、唐文標（1936-1985）、陳少聰（1941-）、鄭清茂（1933-）等人經常在六松山莊聚會。聚會內容頗為風雅，議論古今、品評詩文人物，時有音樂助興，在劉大任看來，成功營造出一種「古中國」的氛圍。²⁵陳世驥的師承關係，使他們在異鄉迅速建立起密切的人際網絡：

我們遂常見面，並自詡為「陳公門下行走」。雖略帶自嘲意味，但也免不了像楊牧借陳與義詩句「座中多是豪英」所表達的，有點沾沾自喜吧。²⁶

22 張楊，〈亞洲基金會：香港中文大學創建背後的美國推手〉，《當代中國史研究》22.2（2015.2）：91-101。

23 史誠之，〈桃李成蹊南山皓——悼陳世驥教授〉，頁392。

24 阮毅成遺作，〈中央工作日記（一二一）〉，《傳記文學》109.1（2016.7）：138。

25 劉大任，〈六松山莊〉，《我的中國》（臺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2000），頁42。

26 劉大任，〈松棻走了〉，《晚晴》，頁106。

因為他的威望和影響力，陳先生的保護傘下卵翼著不算小的一批流落海外的知識精英……六松山莊每逢周末假日常有夜會，名流學者與頭角崢嶸的青年學子共聚一堂，唇槍舌劍之餘，有時竟予人海外『群英會』的幻覺。²⁷

「陳公門下行走」、「座中多是豪英」、「群英會」，這些詞語勾勒出群體認同的誕生。初抵柏克萊之際，柏克萊保釣作家的互動基礎，一定程度上可謂仰賴陳世驥的資源供給而建立的。²⁸

不過，六松山莊聚會偏向較為隨性的藝文交流，並未凝聚出具有同一性的主張與實踐。另一方面，群體意識的建立，也標記了區別異己、重新劃界的開端。六、七〇年代之交的美國正是學潮風起雲湧的年代，黑人民權運動、反戰、反文化運動接續狂飆，柏克萊更是北美左翼學潮重鎮，為稍後釣運左翼的發端鋪墊基礎。

時局的激昂，以不同方式催化了這批留學青年的思想。當時六松山莊門生中，至少隱含三組意識型態的伏流：左傾的劉大任、郭松棻、李渝、唐文標，認同左翼自由主義，但反對激進行動的張系國，以及和實際政治作為保持距離、致力於學術的楊牧²⁹等人。

27 劉大任，〈六松山莊〉，頁 39。

28 此處需要對他們赴美前的交遊情形略作交代：1962 年李、郭在臺大「英詩選讀」課堂相識，1963 年李、張共同參與聶華苓開設的「小說與創作」課程。劉、郭、張初識的時間點均為已展開留學規劃的 1966 年，分別在與丘延亮、邱剛健等人聚會時相識。楊、唐 1960 年透過黃用介紹開始通信，其後楊將唐介紹予劉等人。楊、張初次見面則是 1966 年在柏克萊。儘管留學前夕他們已有零星往來，其中並涉及左翼（民主台灣聯盟案）和現代主義（《劇場》雜誌）兩派人士在臺北藝文圈的活動，但進一步形成群體網絡，實有賴六松山莊的密集聚會。聶華苓，〈癡情嘆息——讀《應答的鄉岸》隨感〉，《聯合報》2000.1.8，37 版；劉大任，〈松棻走了〉，頁 105；張系國，〈我為什麼編域外集〉，《文訊》316(2012.2): 83-85；楊牧，〈那迎面的風——哀悼唐文標〉，《飛過火山》（臺北：洪範書店，1987），頁 183-185；楊牧，〈張系國的關心與藝術〉，《文學知識》（臺北：洪範書店，1986），頁 97。

29 留學初期，楊牧與劉大任等人往來密切。在楊牧筆下，可看到左翼學潮對其思想與創作的衝擊，1972 年由筆名「葉珊」易名「楊牧」，也標示了此一轉折。不過，釣運爆發時，楊牧已在波士頓任教，並未涉入運動，相關消息是由郭松棻所轉告的。在本文

伴隨學潮逐步升溫，座中諸人的立場差異日漸突顯。陳世驥對左傾學生輩的思想變化並非無所覺察，嘗試疏導但未竟其功。³⁰ 保釣運動爆發後，六松山莊的榮景從此消散。

三、抒情的兩種政治

從劉大任追溯留學生活的散文和郭松棻手稿中未完成的〈保釣回憶錄〉³¹ 可看到，「陳世驥／六松山莊」與「保釣運動」，隱然構成他們在柏克萊時期不同實踐階段的象徵。陳世驥其人其事，被標誌為從保釣前夕過渡到保釣時期的重要節點。然而，這樣的敘事分野是怎麼形成的？此間的劃分依據，又透露什麼樣的暗示？

在學生輩眼中，陳世驥是個「生於中國國恥教育，長於抗戰救亡運動的知識分子……表面看不出任何煎熬但眉眼之間總是藏著某種愁悶的長者」，³² 對故鄉「如此深愛，卻又絕口不提」。³³ 根據商禽和唐文標所作訪談，來美後，陳世驥曾兩度計畫返回中國。第一次為 1941 年，陳世驥在哥倫比亞大學做研究的階段，準備返國之際遭逢珍珠港事變，遂留柏克萊執教；³⁴ 第二次為 1948 年前後，陳世驥考慮回北京大學教書，艾克敦（Harold Acton, 1904-1994）勸陳世驥留在美國傳播中國文化，認為從事學術生產較涉入政爭有益，並計畫共同翻譯〈桃花扇〉，以移轉陳世驥對國事的焦慮。³⁵

的論述視野下，楊牧的案例別具參照意義，在於楊牧作為陳世驥的衣鉢傳人，選擇其認可的「抒情」之道以為立身方式。楊牧的案例值得詳加探討，擬留待未來另文討論。

30 郭松年著，許倍榕、曾巧芸執筆，《望鄉：父親郭雪湖的藝術生涯》（臺北：馬可孛羅文化，2018），頁 180-181；劉大任，〈六松山莊〉，頁 41。

31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郭松棻手稿，檔案典藏號：ntul_mf0044_151_07-0003（〈保釣回憶錄〉）。

32 劉大任，〈六松山莊〉，頁 37。

33 楊牧，〈北方——石湘先生十年祭〉，《搜索者》（臺北：洪範書店，1984），頁 158。

34 商禽，〈六松山莊訪陳世驥教授問中國文學〉，《幼獅文藝》32.6(1970.6): 65。

35 唐文標，〈斷竹·續竹·飛土·逐穴〉，頁 157。關於陳世驥的考量存在不同說法。莊信正提到，陳世驥的第一任妻子為聲樂家姚錦新（1911-1992），弟弟為中共政治人物姚依林（1917-1994），1947 年姚錦新返回清華大學就職，陳世驥堅決反共，兩

究竟什麼樣的「中國」值得依歸，顯然是成長於三、四〇年代的離散知識分子必經的課題。在六松山莊晚會上，陳世驥曾對學生輩談及 1952 年美國總統大選之際，他對認同問題的思考：

我變更身分的時候，也想過這個問題。那時候是史蒂文生對艾森豪。我聽史蒂文生演講，看他的文章，就想，如果允許這樣好學深思、溫文儒雅的人出人頭地、主持政局，美國這個文明也許值得愛護，做一個美國人，也許值得自豪。³⁶

世變後，美國的民主價值，成為離散知識分子之替代性精神所繫——諷刺的是民主黨的史蒂文生並未當選，而海外終究是他邦、是異鄉。

儘管陳世驥在柏克萊享有崇高的學術地位，從夏氏兄弟通信的側面記載可看出，他對所處研究環境未盡滿意。陳世驥認為美國的中國研究現況並不理想，³⁷ 對如何擴充中國學人的勢力感到焦慮，³⁸ 身兼數職、日夜勞心應酬。³⁹ 陳世驥不僅要「應付」中文不精的外籍研究者，又須與中國研究中心諸多敵視文學的社會科學家共事。⁴⁰ 如此觀之，其學術生涯恐怕不如表面上那樣風光。⁴¹ 1970 年與楊聯陞（1914-1990）的通信，遂有此

人遂在顧孟餘（1888-1972）協調下分手；劉大任則記載，老舍 1949 年返回中國前曾赴陳世驥寓所長談，相約若一切順利，便來信通知陳世驥「共赴建國大業」。目前未能查得其他文獻佐證此說。但可以確認的是，五〇年代以降，陳世驥對「自由中國」的認同是明朗的，1969 年受訪時，也直指「自由中國的基地在臺灣」。莊信正，〈追憶陳世驥〉，《中國時報》2014.1.31，A13 版；劉大任，〈六松山莊〉，頁 45；張研田，〈卅年往事憶世驥（之二）〉，《傳記文學》25.1(1974.7): 29-34；商禽，〈六松山莊訪陳世驥教授問中國文學〉：72。

36 劉大任，〈六松山莊〉，頁 40。

37 王洞主編，季進編注，《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卷四（1959-1962）》（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9），頁 281；王洞主編，《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卷五（1962-1965）》，頁 123。

38 王洞主編，《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卷五（1962-1965）》，頁 102。

39 王洞主編，《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卷四（1959-1962）》，頁 536、540。

40 王洞主編，《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卷五（1962-1965）》，頁 180、369。

41 陳世驥將心緒掩埋之深，即使與之最親厚的夏氏兄弟也未必能夠洞徹。從夏志清 1962 年致夏濟安的信，談到在美學人的心理狀況可見一斑：「楊聯陞也給我鬱鬱寡

感嘆：「卅年知心之交，家國之遭，番邦之遇，弟與兄所歷所處多同」。⁴² 儘管羈留美國多年，在學生輩眼中，陳世驥「過的仍是中國式的生活」。⁴³

另一方面，當陳世驥選擇留在美國，他便立意以學術事業作為政治實踐的替代方案。陳世驥對學生輩的叮嚀，何嘗不是對自己的提醒？楊牧曾提到：「他要我們先在學術上站住腳，做一個有內容有見解有骨氣的中國人。」⁴⁴ 1970年接受唐文標訪談時，也透露這樣的心境：

個人就業的地區有時候不容你自由選擇。但研究工作還得做下去，也只好如此了。……在外國多少有點不得已之情，但退一步說，缺陷中亦可想像到某些好處。近世倡導的科學方法，使我們也可以講學術上的客觀，**在未參與歷史行動之下，退求其次，以不得已的心情整理國故……**⁴⁵

當學術研究成為自覺性的政治實踐，是以整理「國故」，嘗試贖回那不可能的「故國」。而陳世驥在美期間最重要的學術成果，便屬抒情傳統詮釋體系的提出。

陳世驥對「抒情」的話語建構可上溯到四〇年代末。⁴⁶ 五〇年代初，

歡的印象，他和劉子健一度都精神不正常，假如在中國做教授，決不會如此的。世驥一直精神很好，談笑風生，是不容易的。」同上註，頁133。

42 楊聯陞，〈追懷石湘——陳世驥選集序〉：19。

43 唐文標，〈斷竹·續竹·飛土·逐穴〉，頁157。

44 楊牧，〈柏克萊——懷念陳世驥先生〉，《楊牧自選集》（臺北：黎明文化，1977），頁280。

45 唐文標，〈斷竹·續竹·飛土·逐穴〉，頁161-162。粗體為本文所加。

46 陳國球已為我們闡明，陳世驥1948年對陸機〈文賦〉的閱讀寄寓去國懷鄉的心緒，可視為抒情精神的一種體現。陳國球並援引艾克敦回憶錄裡相當關鍵的觀察，指出對文學的信念，使陳世驥在說客眾多的情況下，面對回去中國或留在美國的猶疑，選擇後者，繼續薪傳中國文化。陳國球，〈「抒情傳統論」以前——陳世驥早期文學論初探〉：225-251。細讀艾克敦的回憶錄，其對陳世驥的看法，有一處有別於劉大任等人的觀察。艾克敦認為陳世驥已在學術志業中找到安頓己身的方式，順利融入移居地——儘管兩人私交甚篤，身為英國人的艾克敦顯然難以理解陳世驥的離散之思。Harold Acton, *Memoirs of an Aesthete, 1939-1969*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71), 263.

已見諸對「詩」這一關鍵詞的系譜爬梳。⁴⁷ 1971 年 3 月，保釣運動海外第一次大遊行結束不久，陳世驤在美國亞洲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簡稱 AAS）年會比較文學組發表開幕詞〈論中國抒情傳統〉（“On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在比較文學視野下，正式提出「抒情傳統」一詞：「如果說中國文學傳統從整體而言就是一個抒情傳統（lyrical tradition），大抵不算誇張。」⁴⁸

在這篇演講詞中，陳世驤將抒情傳統的起源，歸諸「個人化語調充盈其間，再加上內裏普世的人情關懷和直接的感染力」⁴⁹ 的《詩經》，而《楚辭》——他稱作「楚地哀歌」（“Ch’u Elegies”），「代表了抒情的另一個主要方向」，⁵⁰ 在陳世驤看來，《楚辭》的篇章皆由抒情體組成，包括祭歌、頌詩、悼辭、葬歌，或其他「主觀地、激情地抒發一己之渴求、控訴、吶喊的韻文」。⁵¹ 這兩組源頭共同確立了中國文學的抒情航道。

《楚辭》的抒情特徵究竟如何有別於《詩經》，陳世驤於此並未加以闡釋，但他已指出抒情的出發點雖在「情」的流注，並不局限於私領域的情感，尚包括「或公或私之自抒胸臆的主體性」，⁵² 例如孔子談詩是為「言志」，既涉欲望、意向，也是「懷抱」（aspiration）的表達。⁵³

1973 年 6 月發表於《清華學報》的遺作〈論時：屈賦發微〉（“The Genesis of Poetic Time: The Greatness of Ch’ü Yuan”），對〈離騷〉的討論進一步詳釋這點：

47 陳世驤，〈尋繹中國文學批評的起源〉（“In Search of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收入張暉編，《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陳世驤古典文學論集》，頁 10-32。

48 陳國球，〈抒情中國：論中國抒情傳統〉，《抒情中國論》，頁 20；原文刊於 Chen Shih-Hsiang, “On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 Opening Address to Panel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AS Meeting, 1971,” *Tamkang Review* 2, no. 2/3, no. 1 (October 1971/April 1972): 17-24.

49 同上註，頁 16。

50 同上註，頁 17。

51 同上註，頁 17。

52 同上註，頁 22。

53 同上註，頁 22。

該詩章竟英勇地以面對憂患為己主。這就是屈原作品《離騷》的題旨……司馬遷謂“離騷者，猶離憂也”，也就是遭受憂患、面對憂遭的意思。它剖白人類所有的心緒，居於最深刻的人類的焦慮中，與人類在時光之流中面臨的“存在”、“自我身份”問題相搏鬥……⁵⁴

陳世驥指出，〈離騷〉作為政治情愛複合詩（politico-erotic poem），呈顯「個我情感」與「感時憂國」的聯繫：

它可說是一高亢的抒情詩、一哀曲。但這悲劇性的完全主觀獲得了普遍性，獲得了一顯著的世界性（Weltschmerz），因為個人的情緒與私人的感情相聯結也同時與對國事大公無私的關注相聯結。⁵⁵

值得注意的是，陳世驥著意突顯詩中人的英雄形象，反覆強調死亡的願望在後數章已告緩解，對自殺的解讀提出辯駁。⁵⁶ 陳世驥寫給楊聯陞的信指出，這篇論文是「大有感而發」、懷抱「背後用意」之作。⁵⁷

屈原的抒情，透露孤臣孽子的心志。在陳世驥的詩學論述中，「情」與「志」向來是相互演繹的概念。早從〈尋繹中國文學批評的起源〉（1951）一文，追溯「詩」字的起源與流變時，陳世驥便指認中國詩學由「詩言志」過渡到「詩緣情」的發展。「志」在定義上的曖昧性，為它保留與「情」匯通的空間，既可指稱道德與實用目的，也與美學、心理學的涵義密不可分，奠定後世批評家以「情感的無目的的的目的性」闡釋詩歌與文學的基礎。⁵⁸

這樣的思路提供我們深入洞察其抒情話語內涵的關鍵——陳世驥不僅僅是抒情傳統的建構者，更進一步而言，陳世驥本身便是抒情現代性的實踐主體。陳世驥欲抒之「情」，從來不單是溫柔敦厚的詩教，他對抒情

54 陳世驥，〈論時：屈賦發微〉，收入張暉編，《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陳世驥古典文學論集》，頁 172。

55 同上註，頁 179。

56 同上註，頁 187-191。

57 楊聯陞，〈追懷石湘——陳世驥選集序〉：19。

58 陳世驥，〈尋繹中國文學批評的起源〉，頁 10-32。

的體認，載負了關於現代中國命運的思索。⁵⁹ 當陳世驥立意以學術工作傳承中國文化，便開啟一條透過文學的中介，警議歷史與政治的途徑。⁶⁰

考量陳世驥在美國亞洲研究學會提出抒情傳統的時間點，正值保釣運動風起雲湧之時。彼時陳世驥身為東方語文學系系主任，忙於疏導調停。這使得抒情傳統的提出時機，提供了極具象徵意義的歷史暗示——透過「創造抒情」，構成「超越革命」的呼召。陳世驥未必自覺地將抒情傳統視為對鈞運左翼話語的反撥，然其研究路徑的開展和主體實踐姿態，確以對「情」的審美，挑戰了壁壘分明的現代政治律令，重新豁顯詩教為與不為的要義。

鍾秩維的研究，已為我們闡明保釣運動與抒情傳統這兩組話語系統內含可溝通性和可連結性，二者皆指向身居異鄉者對故國的介入，在政治與文化上認同「中國」，並視文學為傳介本真的「民族」的形式。⁶¹ 然而這畢竟是後之來者的洞見。在七〇年代，它們是在截然不同的話語平面上為雙方所認識的。

在此也需要考慮美國亞洲研究學會的定位。當時美國的中國研究正在經歷內部分化，親中國的學者從亞洲研究學會出走，另行成立「關心亞洲學者委員會」(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簡稱 CCAS)，⁶² 在年輕左翼學者眼中，美國亞洲研究學會是集結上一世代右翼學者的陣營。在這樣的背景下，陳世驥的抒情倡議，更難避免「反動」的聯想。

陳世驥對抒情話語的建構，乃至他傳道於學生輩的古典知識，成為他們依據左翼價值認識現代中國的對照組。劉大任便指認陳世驥聚會的「舊中國」情調，是他認同「新中國」的自覺性分野。⁶³ 而陳世驥所致力經營，

59 陳國球，〈導論「抒情」的傳統〉，收入陳國球、王德威編，《抒情之現代性：「抒情傳統」論述與中國文學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14)，頁 25。

60 1971 年 1 月陳世驥為《夏濟安選集》所撰序言，也呼應這樣的思考。陳世驥將夏濟安與艾略特、劉勰對照，強調他們的寫作皆出於歷史轉折的苦難階段，呈顯作者對時代的抒情感應。而陳世驥所期待者，是藉由撰述工作破開現實的昏暗障蔽，完成「新生的廣義的中國文明」。陳世驥，〈夏濟安選集序〉，《傳記文學》18.4(1971.4): 89。

61 鍾秩維，〈行動中的藝術家——李渝文學的當代性〉，頁 153-162。

62 劉大任，〈不安的山——記七〇年代的一次旅行〉，收入楊澤編，《七〇年代——理想繼續燃燒》(臺北：時報文化，1994)，頁 77-78。

63 劉大任，〈六松山莊〉，頁 41。

最初夏濟安所稱「為反共而學術」⁶⁴的東方語文學系圖書館與中國研究中心，也被他們挪用為滿足中國熱的知識寶庫。⁶⁵

郭松棻 1968 年發表的〈文學與風土病〉，對他們這個階段如何負面地解讀傳統意義——陳世驥被「聯想」的那種「抒情」，有相當清楚的表述：

我詬病於 M 的就是他不能將自己抽離於那些他書中所述的病例——「虛無」、「沮喪」、「徘徊」、「憾恨」、「空無的本身無法表述」等等——而加以反芻。他抱緊這些病就謳歌頓呼（抒情），這與台灣「作妮子態」的文學情調又有什麼二致？……

凡是對現實或自己的感覺經驗沒有批評能力的都是妮子，而掩藏在「抒情」背後的正是這個。

而我反對「抒情」的理由是它趕不上台北的時代氣候。……至少我在台北時，我的情感經驗（每天早晨翻開報紙，看到的問題是：槍殺、自殺、盜豆、雞妓、公共汽車、原子塵、越戰、第七艦隊……）不可能在「抒情」裏敲起一丁點共鳴。⁶⁶

在郭松棻看來，「抒情」迴避了六〇年代的現實問題。提出對抒情文學的批判後，郭松棻緊接著表明他對新批評閱讀方式（那正是陳世驥傳授於郭的——）難以苟同，認為同樣迴避了對歷史脈絡的判斷。⁶⁷

這是抒情的兩種政治了。這個階段，劉大任等人所信仰的抒情律令，體現於「情迷中國」的召喚。⁶⁸ 王德威曾以「紅色抒情」一詞勾勒左翼知

64 馬逢華，〈夏濟安回憶（中）〉，《傳記文學》40.4(1982.4): 46。

65 李渝，〈射鵬回看〉，收入李渝、簡義明編，《郭松棻文集：保釣卷》（新北：印刻文學，2015），頁 399。

66 乙畝（郭松棻），〈文學與風土病〉，《大學》1.4(1968.9): 10-11。這篇書信體小品藉由與友人辯難「M」（應為孟祥森）的寫作美學，展開一己文學觀點之析論。

67 乙畝（郭松棻），〈文學與風土病〉：11。稍後〈談談台灣的文學〉一文，郭更點名新批評「退而隱入個人的小世界」，被引入臺灣後「助長了保持現狀的意識形態」。羅隆邁（郭松棻），〈談談台灣的文學〉，《抖擻》1(1974.1): 54-55。

68 「情迷中國」來自陳國球對夏志清 1967 年發表的“Obsession with China: The Moral Burde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一文之修訂譯法。李浴洋，〈夏志清的「情迷

識人對共產主義的嚮往，依據王德威的闡釋，革命有其審美的層次，以此號召參與者義無反顧的精神或力量。這樣的革命情懷所具備的抒情核心，不僅牽繫西方浪漫主義文學的流變，也影響五四一代的中國作家，使他們期望藉由革命重新樹立審美主體，構成二十世紀的「紅色抒情」現象。⁶⁹

七〇年代保釣運動所承襲的，便是這樣一組經由三〇年代中國文學的中介，繼與美國左翼學潮合流的抒情範式。他們對「情」的體識，遂有繁複深厚的淵源：一方面向西方革命浪漫主義借鑑資源，強化英雄崇拜與光明前景；一方面重拾五四的啟示，提煉以魯迅（1881-1936）「黑暗的閘門」⁷⁰ 面向現代性議題，深具憂患意識的抒情內涵。

革命浪漫主義與憂患抒情亦非截然二分。五四知識分子對情感的理解本就深受浪漫主義感召，他們發揚的，主要是魯迅所標榜以拜倫為代表的「摩羅詩人」，即積極浪漫主義這一派。⁷¹ 1938 年毛澤東的「革命的浪漫主義」口號與 1958 年的「兩結合」律令，更清楚規範以集體價值為依歸的典律。在多重話語翻譯下，保釣的紅色抒情，遂呈現澈底審美政治化的結果，究其本質不在「抒情」，而是「革命」。⁷²

若欲進一步把握保釣語境下的「紅色抒情」話語，由保釣所衍生的左翼文藝運動將提供我們若干線索。1970 年底北美釣運爆發，柏克萊的

中國」陳國球訪談（下）》，「自由微信」網站，2020.1.1，<https://freewechat.com/a/MzA5ODMwMTgxOA==/2734699389/1>（2022.5.21 上網檢索）；保釣語境如何回應「情迷中國」的要義，參閱拙文，〈左翼烏托邦——劉大任「保釣文學」研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42(2022.12): 233-234。

69 見第三講〈紅色抒情——從瞿秋白到陳映真〉。王德威另於第五講指出，保釣世代的左翼實踐亦是「紅色抒情」的體現。王德威，《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課》（北京：三聯書店，2010），頁 132-163、217。

70 魯迅 1919 年於〈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所提出「黑暗的閘門」一說，如何構成柏克萊乃至海外釣運的精神綱領，參閱拙文，〈左翼烏托邦——劉大任「保釣文學」研究〉：237-238。

71 盧文婷，「德國浪漫主義與中國文學（從晚清到『五四』）」（湖北：武漢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論文，2012），頁 29。

72 另見拙文，〈典範承繼·多重渡引·烏托邦——李渝的抒情美學與保釣反思〉，《臺灣文學研究學報》37(2023.10): 170。

政治行動在初步的示威抗爭後，很快地以抒情的形式得到轉化與深化。1971年春第一次保釣大遊行落幕，面對現實的挫敗，柏克萊保釣作家改以文學實踐作為政治行動的替代方案。⁷³左翼文藝運動便在這樣的思考框架下展開，發展出辦刊物、話劇演出、錄製廣播電臺等形式。

其中，他們對保釣刊物《戰報》、《柏克萊快訊》和《東風》的經營，可謂具體而微地展現「紅色抒情」的要義。以《戰報》為起點，他們發展出一種為回應運動訴求而生的體裁：「戰報體」。⁷⁴

「戰報體」的政治宣傳性質極為濃厚，就其形式與內容而言，堪稱使用了文學的基本表現手法的教條作品。例如《戰報》第二期署名「馬不食」的作者的打油詩〈回頭草——調寄滿江紅贈張北海〉，批判運動者張北海的立場左右搖擺，籲其「回頭」，以免破壞統一大業：

歸國講學樂融融 也是毛虫 釣魚台 賣白膏藥 禍延祖宗 昨天研讀毛澤東
明天回台見蔣公 莫等閒 中國成一統 全落空

才子氣 猶未減 高手夢 付東風 想當年 主意左右擺動 社會學說且收起
革命時髦搞不通 待從頭 收拾股票業 做富翁。⁷⁵

這首詩所欲召喚的，並非審美的詩情，而是政治的決斷。再看《戰報》第一期的發刊詞，其寫作方式體現了「戰報體」典型的論述風格。開篇使用大量疑問句提起下文：

一二九示威之後，許多人都問：「下一步我們應該怎樣做？」……也有很多人問，我們的示威遊行到底產生了什麼效果？遞到日本領事館及國民政府領事館的抗議書及其他宣言文獻，是不是被扔進了字紙簍，或歸之於官僚機構的檔案櫃，從此束之高閣？……歸根結底，釣

73 劉大任，〈戰報〉，《我的中國》，頁 77。

74 這個詞彙是由李渝所提出。周昭翥，〈鄉的方向——李渝和《印刻文學生活誌》編輯部對談〉，收入梅家玲、鍾秩維、楊富閔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18：李渝》，頁 103。

75 馬不食，〈回頭草——調寄滿江紅贈張北海〉，《戰報》2(1971.6): 62。

魚台列島的領土主權問題能不能受此影響而有爭回的希望？⁷⁶

接著進入正題，以高密度的形容詞語激起讀者的情緒，搭配格式化的句型，期能達到宣傳效果：

顯然，問題問得越多，我們的失望也越多；失望越多，我們的憤怒就越加高漲。……留學生到今天之所以成為這樣一種荒唐可笑，認同關係模糊，變相移民，填補美國就業夾縫的可憐蟲，不是沒有原因的。……是我們自己的沉默，自己的散漫，自己的懶惰而宿命論者的手，捏在我們這一代人的命運的脖子上，讓我們自己窒息，讓那些既得利益階層的人胡亂擺佈我們國家的命運！……⁷⁷

收尾則用驚嘆號強化語氣：「全世界有中國人的地方，以釣魚台事件為中心的一個愛國運動正方興未艾。讓我們勇敢站起來!!!」⁷⁸

從典範人物觀察，也可使我們對保釣話語有更深微的體會。在以柏克萊為骨幹的北美釣運左翼群體中，魯迅有著「革命導師」的崇高地位。但以面向革命的姿態而言，魯迅實非最貼合運動目標的典範——這個名字

76 (美) 柏克萊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戰報——廿九示威專號》1(1971.2): 1。

77 同上註，頁 1。

78 同上註，頁 2。在郭松棻手稿中，存有中國工人作家李雲德的左翼小說《沸騰的群山》書評，頗為精要地呈現他們這個階段對左翼文藝的認知：「……描寫工人農民，覺醒的知識份子，推翻舊社會的鬥士；在服務的對象上不迎合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的有閒階級的口味，而反轉過來，要給工農群眾培養階級感情，給知識份子作再教育的準備；在觀點上，唾棄為藝術而藝術的遊戲論，不耽溺于個人失落，不講究天人合一，不養『悠然見南山』的心境，而反轉過來，要風發雄勃，要追求八、九點鐘的太陽，而生命的過程是一連串為被壓迫的人民求生存爭發言權的鬥爭。這是截然不同的一種新文學，這是真正的文學革命……」依據郭的敘述，創作動機是為達成思想再造，追求足以催發鬥爭能量的風格，純粹美學品味，或個人情感與生命情調的抒發，均不在其考量範圍。這樣的描述，已清楚彰顯「紅色抒情」的內涵。李渝、郭松棻另藏有 1972 年版《沸騰的群山》，末頁標註「1973.1.22」，可能為郭讀完本書的日期。從文章內容配合筆批日期判斷，這篇書評應出自郭七〇年代的手筆。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郭松棻手稿，檔案典藏號：ntul_mf0044_089_01-0002 (〈介紹《沸騰的群山》〉)；李雲德，《沸騰的群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頁 463。

反而可能是二〇年代批判魯迅最烈的郭沫若。那麼，何以魯迅得獲保釣青年的青睞，被安上神壇？

魯迅的憤世姿態固然關鍵，但我認為，魯迅在革命青年中催發的情感動能如此強大，毋寧更與其人濃厚的浪漫色彩息息相關——不是傷春悲秋的繾綣抒情，而是「釋憤抒情」。⁷⁹

「釋憤抒情」典出屈原《九章》〈惜誦〉：「發憤以抒情」，描述奮進對抗現實的內在力量。魯迅堪稱中國近代史上，將浪漫精神與國族啟蒙聯繫的前驅者，由此確立其以「吶喊」、「徬徨」的姿態介入社會的形象。

激進的政治行動向來成之於抒情與革命的複調。柏克萊保釣作家日後回溯參與釣運的動機，仍不約而同地指向感性的詩學陳述：李渝肯定王德威以現代主義美學政治化解讀他們投入保釣的原因；⁸⁰ 郭松棻提及釣運亦涵帶抒情色彩，「那時對共產黨有一種寄託和幻想」；⁸¹ 倘若李、郭僅勾勒「抒情」與「革命」相生，劉大任索性以「抒情」置換「革命」的正典性，「我們這一代，『救國』、『救世』不是目的，只是抵抗寂寞的手段。」⁸² 這些陳述在在勾描出關於保釣的抒情政治學。⁸³

79 魯迅，〈小引〉，《華蓋集續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頁1。

80 周昭翥，〈鄉的方向——李渝和《印刻文學生活誌》編輯部對談〉，頁102；王德威，〈無岸之河的渡引者——李渝的小說美學〉，收入李渝，《夏日踟躕》（臺北：麥田出版，2002），頁8。

81 簡義明，「書寫郭松棻：一個沒有位置和定義的寫作者」，頁181。

82 劉大任，〈艱難苦恨繁霜鬢〉，《我的中國》，頁5；另見拙文，〈典範承繼·多重渡引·烏托邦——李渝的抒情美學與保釣反思〉：169。

83 更擴大來看，以感性啟引作為革命動能的支撐，是彼時海外釣運左翼的共同文化。我們可以在保釣一代青年的回溯中，找到許多足以引發類似聯想的關鍵詞：熱火朝天、烏托邦、宗教與愛情等。《春雷聲聲》一書序言，其中一節更逕以「釣／統運的浪漫主義精神和理想」為題。江青，〈又見柏克萊〉，《明報月刊》網站，2019.3.29，<https://mingpaomonthly.com/article/details/思潮%EF%BC%8E動向/2019-04/1590997546313/> 又見柏克萊（江青）（2022.11.27 上網檢索）；劉大任，〈柏克萊那幾年〉，《閱世如看花》（臺北：洪範書店，2011），頁50；李黎，《樂園不下雨》（臺北：印刻出版社，2007），頁236；林國炯等編，《春雷聲聲：保釣運動三十週年文獻選輯》（臺北：人間出版，2001），頁9-10。

在陳世驥向北美學界揚起抒情傳統的旗幟之際，紅色抒情的浪潮早已如火如荼地襲捲學生輩的視野。在革命的美學範式中，其從前現代中國孵育的抒情想像，遂被視為右翼反動語言來理解，抒情語境所內蘊的感時憂國意涵，也被窄化為以個人本位出發的詩學表達。而陳世驥的離散心事與冷戰人文主義的迂迴表述，在激昂的運動者眼中，不過是經歷世變後沉湎於個人前途，「怯懦，沉默，容忍，姑息」的「海外知識人」⁸⁴的典型罷了。⁸⁵

四、弑師

上述兩種抒情的政治，勾勒出 1949 後第一代離散知識分子，與在美國左翼學潮洗禮下成長的學生輩的差異。唯直至保釣前夕，這兩種抒情美

84 劉大任，〈反誣讎！反恐嚇！！反迫害！！〉，《戰報》2(1971.6): 14。

85 陳世驥與左翼學生輩的扞格，也可從魯迅的線索追蹤。劉大任曾將他們與陳世驥的差異，凝聚於對魯迅的詮釋來理解。陳世驥對魯迅的觀點，見於論文〈波蘭文學在中國與作為「摩羅詩人」的密茨凱維奇〉（“Polish Literature in China and Mickiewicz as ‘Mara Poet’”）（1956），以及夏氏兄弟通信中所載，六〇年代中期捷克漢學家普實克（Jaroslav Průšek）與夏志清之爭激盪的火花。〈波〉文中，陳世驥突顯魯迅的反抗者形象，認為波蘭詩人密茨凱維奇與魯迅在精神、情感上互相輝映，這個階段他所理解的魯迅，是秉持入世的抒情精神，舉起革新旗幟的先驅者；普、夏之辯，則反映六〇年代以降陳世驥看待魯迅的視角變化。這場論辯起自普實克和夏志清在荷蘭《通報》針對《中國現代小說史》展開的論爭，1963 年 4 月普實克應陳世驥之邀訪學柏克萊，時值夏濟安任職中國研究中心，透過夏濟安的「代理」，雙方有了延續討論的機會。他們的論辯焦點在魯迅加入左聯後創作力衰退的問題，陳世驥的觀點與夏氏兄弟相近，批判左翼教條損害了魯迅的創作心靈。陳世驥對魯迅的批評，折射出旅美離散學者面對逐日升溫的左翼浪潮的焦慮感，正是在這層意義上，對魯迅的批判轉向，構成其自身政治立場的間接表述。這場論辯發生的時間點，距柏克萊保釣作家抵美僅三、四年——倘若陳世驥向學生輩講述的魯迅，便圍繞著這道「黑暗的閘門」開展，他的觀點自然與劉大任等人格格不入。劉大任，〈六松山莊〉，頁 42-43；陳國球，〈異域文學之光——陳世驥讀魯迅與波蘭文學〉，《抒情傳統論與中國文學史》（臺北：時報出版公司，2021），頁 95-110；[Chen Shih-Hsiang], “Polish Literature in China and Mickiewicz as ‘Mara Poet,’” in *Adam Mickiewicz in World Literature*, ed. Waclaw Lednick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6), 569-81; 王洞主編，《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卷五（1962-1965）》，頁 180-184。

學所暗示認同與實踐的扞格，並未進一步形成針對性的批判論述。釣運爆發後，陳世驥對釣魚臺主權問題的公開表態，方成為他與劉大任等人正式分道揚鑣，遭到群起而攻之的轉捩點。

1971年3月16日，《中央日報》刊出一封旅美學者的聯名上書，聲明如下：

蔣總統鈞鑒：

釣魚臺羣島為中國領土，法理史實均確定無疑。同人等謹請政府保持堅定立場，抵抗日本新侵略。並在釣魚台主權問題未解決之前，請堅決拒絕參加所謂「中日韓聯合開發海底資源協議」之簽訂會議。同人等身居海外，心懷邦國。事關國家大計，不忍緘默，至希垂鑒。

旅美教育界科學界同人敬啟⁸⁶

根據張研田的說法，這篇上書由陳世驥和同樣任教於柏克萊的陳省身、李卓皓發起。⁸⁷上書目的並非勸諫，而是考量到學生與青年教師異議漸起，認為這是政府「廣收人心，普建威信之良機」，為「支持政府」，發起上書「以清視聽」。⁸⁸張研田並提到，事前陳世驥、陳省身已向總領事周彤華打過招呼，與官方建立默契。⁸⁹

不過，張研田所言似未取得各校參與學者的共識。這份連署名單包含釣運左、右翼與中間派人士，彼時已取得教職的張系國、唐文標均名列其中。陳世驥之所以遭到釣運學生批判，應起因於稍後回覆政府的談話內容。

同年3月19日，總統府秘書長張群代表蔣中正函覆聯名上書，3月21日，《中央日報》刊出旅美學人的回應，報導中引用陳世驥的說法，肯

86 本報訊，〈我旅美教育科學界人士上書蔣總統 強調釣魚台群島為我國領土〉，《中央日報》1971.3.16，2版。

87 更常見的說法是由陳省身、趙元任發起。劉源俊，〈我所知道的留美學生保釣運動〉，收入丘為君等編著，《台灣學生運動（1949-1979）》（臺北：龍田出版，1979），頁548。

88 張研田，〈卅年往事憶世驥（之二）〉：33。

89 同上註。

定國民黨政府的作為，並指出留學生對政府有所誤解：

陳博士指出，張秘書長的覆函，已毫不含糊地表明了中華民國政府對釣魚台案的堅定立場，同時也使我們得悉我相信這項覆函，已澄清並將繼續澄清流傳於若干旅美僑胞之間對於這些問題的一些誤解。陳世驥博士說，他對張秘書長的覆函深表滿意。他同時表示，他相信他所熟識的許多其他聯署人，和他具有相同的看法。⁹⁰

報導刊出後，陳世驥成為眾矢之的。劉大任回顧他們將陳世驥畫入《戰報》第二期諷刺漫畫的情景：

一九七一年春，大概四、五月間的一個晚上，一群人在我家裡趕編《戰報》第二期。運籌正在畫一幅諷刺漫畫，其中有一個反面人物，就是陳世驥先生。陳老師參加了全美教授給國民政府的一封聯名公開信，國府的答覆，在學生群中引起反感。事後記者訪問陳先生，陳先生表示對國府答覆『基本滿意』。漫畫的標題是『釣魚台大觀園』，實質就是『群丑亂舞』！⁹¹

在同期《戰報》中，他們另以「一教授」為名，發表了一篇擬想陳世驥心聲的〈悔過書〉。〈悔過書〉以陳世驥的視角展開第一人稱敘事，敘事者的老友質問他在公開信上簽名的舉動，藉此對敘事者進行「機會教育」，揭露政府的打壓手段，為保釣的訴求正名。敘事者聞之後悔不迭，反省過去一心想在學術上有所成就，未積極關心時事，對「自由」、「民主」抱持錯誤的認知，以致為人所利用。文中提到「周年大會趕 PAPER，忙得一個不亦樂乎，那有精神料理人世大事」，⁹² 即指陳世驥於美國亞洲研究學會年會發表〈論中國抒情傳統〉一文。這篇〈悔過書〉的撰寫策略，顯然是透過「創造」其反省之詞，支持運動論述。

90 中央社舊金山十九日專電，〈對釣魚台列嶼主權事 政府採堅定立場 旅美學人表滿意〉，《中央日報》，1971.3.21，1 版。

91 劉大任，〈六松山莊〉，頁 43。「大觀園」應為「大觀圖」之誤記。該幅漫畫後刪去陳世驥的角色，見丁羊（傅運籌），〈釣魚台大觀圖〉，《戰報》2: 49。

92 一教授，〈悔過書〉，《戰報》2: 37。

從在美同僚的角度檢視，陳世驥在報端發言的舉動，應包含更複雜的考量。曾任職中國研究所的史誠之提到，1969 至 1971 年初由於學潮洶湧，許多學者不願接下行政職務，陳世驥不畏壓力兼任系主任，照顧教職員的安全，並調節學生的情緒。史誠之觀察到，陳世驥善於排解衝突，也曾出手營救在示威中受傷的記者，使系內局勢得以保持穩定。⁹³ 史誠之如此描述陳世驥對保釣的態度：

他臨故之前，釣魚島行動給他帶來許多難言之憂。他自己當仁不讓，為保衛釣魚島行動進行醞釀、策劃和簽名，上書總統。他的高足多是美國保衛釣魚島行動的中堅分子。就國家主權正義說，他覺得學生挺身而出是應該的，但是他深怕行動過激，荒疏學業還算事小，學生如被逮解出境就事大了。他為此非常憂急不安。⁹⁴

根據史誠之的說法，陳世驥對運動表態，是希望透過雙向協調，達到保護學生的目的。但這樣的苦心，難以被激進的左翼學生輩所諒解。對陳世驥的批判，反向凝聚運動意識，將抗爭推向另一波高潮。

歷史的因緣何其諷刺。就在他們將陳世驥畫入《戰報》諷刺漫畫的當晚，傳來陳世驥心臟病發的消息。⁹⁵ 陳世驥逝世後，劉大任、郭松棻頓失繼續完成學位的資源，不得不改變生涯規劃，離開柏克萊，入職聯合國。⁹⁶

這毋寧是對革命大業最深沉的嘲諷——「反動敵人」的庇蔭，在一

93 史誠之，〈桃李成蹊南山皓——悼陳世驥教授〉，頁 381-382。

94 同上註，頁 389-390。

95 劉大任，〈六松山莊〉，頁 43。陳世驥逝世後，師友的記述皆委婉提到其病發與處理保釣運動的關聯性。夏志清，〈悼念陳世驥並試論其治學之成就〉，《傳記文學》19.5(1971.11): 16；楊牧，〈柏克萊——懷念陳世驥先生〉，頁 280；江青，〈又見柏克萊〉，見註 83。

96 探究陳世驥其人其事，亦能幫助我們釐清關於柏克萊保釣作家生涯轉折的陳說。海外釣運常見「棄學從運」的說法，但劉、郭回顧學位中輟的原因，所提到的關鍵皆非運動的發展，而是陳世驥的猝逝。劉大任，〈蒼白女子〉，收入北美洲華文作家協會編，《縱橫北美——從花果飄零到落地生根》，頁 269-270；劉大任，〈白光·周璇·薩王納〉，《紐約眼》（臺北：印刻出版社，2002），頁 82；簡義明，「書寫郭松棻：一個沒有位置和定義的寫作者」，頁 135、147-148。

定程度上保障他們兼顧運動與學位資格，使他們得以義無反顧地獻身；陳世驤的病逝，因此對柏克萊的運動結構造成直接衝擊，不意洞破理想藍圖的虛無。

陳世驤與釣運的牽繫既如此之深，在柏克萊保釣作家後期的書寫中，我們遂得見其身影或隱或顯地浮現。對恩師的形象塑造，與他們對運動的省思互為表裡。下一小節，本文聚焦於劉大任、郭松棻、李渝對陳世驤的再現，並引入中間派的張系國作為參照，探究他們如何以另一種抒情的技藝——文學創作，反思革命。

五、懺情錄：重寫陳世驤

1967 年 11 月，劉大任在《文學季刊》發表短篇小說〈盆景〉。小說主人翁為沉迷於農業實驗的外省第一代學者華銘泉，夢想透過雜交育種技術，將家鄉江西的貢橘與臺灣本土柑橘結合，培育品質更優良的「蜜橘」。然而華銘泉育種即將成功，仰賴農復會向洛杉磯進口砧木以利改良——倘若移植後能在異地開花結果，無論人或植株，皆已不是原本的純種。

華銘泉與妻子將認同的焦慮，投射在女兒華筠的婚戀問題上。華筠結交了本省籍男友建邦，在華銘泉看來，建邦的本土色彩帶來的挑戰，一如庭院防空洞上兀自生長的蘆葦，不請自來，卻也無法迴避；不過，華銘泉雖未能澈底敞開心胸接受移居地，對下一代的身分認同實抱持半開放的態度。他或對建邦的省籍身分感到不安，卻也不否認「這一份難以捨棄的蕪雜」將帶來令人「總難免也有些歡喜」⁹⁷ 的景象。

保釣前夕的劉，在小說中呈顯世代間認同過渡的情狀。如果華銘泉從江西帶來的貢橘「元老」，以水土不服的形象，投射外省第一代難以落地生根的處境，華銘泉計畫將新品種命名為「豐臺」的願景，則描摹主人翁對於下一代融入移居地，終結離散情境的期盼。從女兒華筠的角度來看，她和建邦雖因省籍差異有所隔閡，這樣的異質性，卻也提供互相理解的契機。

97 劉大任，〈盆景〉，《殘照》（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9），頁 155。

在〈盆景〉中，劉勾勒出不同世代的認同圖像。那麼，甫飄洋過海，在學潮洗禮下重新省思一己歷史座標的劉，又將認同意定錨於何處？

小說結尾透露了這個訊息。建邦入伍前夕，與華筠私自上山，在悄無人煙的時分完成婚禮。小說最後一句以建邦告訴華筠：「有什麼關係，我們有的是時間，將來所有的時間都是我們的。」⁹⁸ 作結——我們不難從這個直白的結局讀取到劉以世代遞嬗作為解方的思考，他對外省第一代雖懷抱同情仍隱有微詞，認為島嶼的未來將由下一代青年主導。建邦的樂觀，業已暗示學潮催發的革命想像。

在散文〈夕燒燈色〉(2002)的回顧中，劉大任記下陳世驥對這篇小說的看法。師生間因本作展開的對話，幾乎構成對〈盆景〉旨趣的另一次演繹。

依據劉的記載，陳世驥讀畢〈盆景〉後，將自身代入華銘泉的角色，直陳對其所屬世代遭遇批判觀點之不滿：

那天，卻鐵青著臉，不是咬著菸斗，是不停地抽著火星直冒的菸斗。劈口便說：「太粗糙了，年輕一代寫得粗糙，年長的一代也粗糙……象徵不能這麼用的……太粗暴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我們都該成盆景了？」

我確實是那樣寫的，也確實是那樣想的。我突然覺悟，老師的棒喝，不是因為他自覺受到羞辱，而是因為他看見他學生的內心裡，有一股按捺不下的殺氣。⁹⁹

數日後，陳世驥邀約劉遊賞舊金山灣岸著名的「夕燒燈色」，醉翁之意自不在酒——陳世驥讚揚沙灘所見雕塑並無暴戾之氣，「他們的心，挺柔軟的」，¹⁰⁰ 這是對革命的勸誡之意了。〈夕燒燈色〉值得留意之處，在於接下來的細節：

當劉領會到陳世驥所言被夕陽染紅的燈，其實是因溫度變色的水銀

98 劉大任，〈盆景〉，頁 177。

99 劉大任，〈夕燒燈色〉，《紐約眼》，頁 22。

100 同上註，頁 23。

燈，面對這「非科學非唯物的作為」，¹⁰¹ 劉並未揭穿。恩師的話語，彷彿在唯物史觀的線性時間外，洞開了另一組抒情時間，使年輕的劉倏然領略唯物與非唯物、理性與非理性的界限實則曖昧難測——這是暫時忘卻革命大業的時刻。當下劉所感受到的是，他們超越了世代與立場的差異，「彷彿彼此都沒有了年齡。」¹⁰²

這個以後見之明來看並未達到效果的啟迪時分，彷彿向歷史預支了時間。陳世驤所教誨於劉者，毋寧是一種抒情的觀視方法，冀望以此超越革命的教義。

〈盆景〉的旨趣和引發的討論，與劉在保釣後自陳紀念陳世驤的短篇小說〈清秀可喜〉（1984），¹⁰³ 構成鮮明的對照。

〈盆景〉以世代的遞嬗接駁革命，〈清秀可喜〉則透露對前行世代和自身的再定位，與和解。從〈盆景〉到〈清秀可喜〉，劉經歷 1974 年實際到訪夢土的幻滅與沉潛，1983 年發表雜文〈走出神話國〉，¹⁰⁴ 標誌國族神話解構的轉捩點。¹⁰⁵ 寫於這個階段的〈清秀可喜〉，字裡行間的懺情意識，也當聯繫於對紅色烏托邦的省思來理解。

小說背景設定於文革期間的北京，敘事者與小田原為教書法的譚老師的得意門生，小田尤其寫得一手好字，模擬譚老師幾可亂真。文革中，敘事者和小田等人共同組織「井崗山戰鬥兵團」，譚老師被打為走資派，昔日所學書藝，被挪用為醜化譚老師形象的工具。就在漫畫完成，眾人交口稱讚之際，傳來譚老師上吊自殺的消息。

其後，敘事者與小田政治立場分裂，敘事者舉發小田撕碎漫畫、「同情走資派」的舉動，導致小田遭到逼供，右手成殘。經此事變，敘事者退

101 劉大任，〈夕燒燈色〉，《紐約眼》，頁 23。

102 同上註，頁 24。

103 劉大任，〈六松山莊〉，頁 43。

104 劉大任，〈走出神話國〉，《走出神話國》（臺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1997），頁 115-119。

105 這是陳世驤的左翼學生輩在保釣後共同經歷的轉折，李、郭皆有類似陳述。李渝，〈射鵬回看〉，頁 399-400；簡義明，「書寫郭松棻：一個沒有位置和定義的寫作者」，頁 155、162-164。

出文革，小田前往邊疆服務。此後十多年，敘事者數度聯繫小田未果，當小田終於回信，已用僅存的左手重新練出譚老師曾讚許「清秀可喜」的字。敘事者幡然領悟那分贖罪的心情：「小田當年撕那幅漫畫，跟我這麼些年來莫名其妙地從不放棄給小田寫信，追到底，不就是同一回事嗎！」¹⁰⁶

小說情節化用他們對陳世驥從師承到叛離的轉折，漫畫一段更明確對應〈六松山莊〉所述《戰報》趕工當晚的情景。如果叛師是投身革命必經的關卡，對恩師的懺情，則透露退離運動後艱難的思想試煉。

2018年劉談到這篇小說：

差不多二十年後，我想寫個故事，紀念陳先生。可是，怎麼寫，都覺得不對勁。文字上，很容易滑入感傷，寫法上，老是拖拖沓沓。最後想到一個辦法，把距離推遠，脫離自己的身邊，脫離保釣，改為“文革”，這才解決問題。¹⁰⁷

劉借位於（同樣奉左翼革命為召令的）文革書寫保釣，這樣的「繞道」，置於其向來直言不諱的創作生涯實屬特例。如同前述，箇中癥結仍應從「情迷中國」的情意結來理解。

依據劉的說法，陳世驥在其思想發展脈絡的關鍵意義，便在於兩度扮演「新中國」藍圖的接著／分離點。劉如此憶述保釣前夕的意識變化：「現在回想，我的『新中國』和『舊中國』，大概就是在六松山莊經常舉行的晚會中，漸漸地分了家。」¹⁰⁸倘若陳世驥對舊中國的抒情，在革命年代被以反動語言解讀，助成他們對新中國的想像，陳世驥之死，則使年少的劉對此一圖景初次產生猶疑：

撫今追昔，不能不承認，那個完美無瑕的空中樓閣——新中國，也許就在我脊椎一陣發冷，修改『保釣大觀圖』的決定中，第一次出現了裂痕，只是當時渾無知覺而已。

106 劉大任，〈清秀可喜〉，《羊齒》（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9），頁99-100。

107 深圳報業2018年重印版《殘照》自序，「浙江新華書店網」，<http://www.zxhsd.com/kgsm/ts/2018/11/09/4242985.shtml>（2022.8.17上網檢索）。

108 劉大任，〈六松山莊〉，頁41。

新中國熱度未退之前，有兩次因緣路過舊金山灣區，始終不能說服自己到陳先生墓前鞠躬致敬。等到我確實說服自己，卻又時移事往，再沒機會回柏克萊了。¹⁰⁹

對陳世驥的追悼，與對革命的反思互為表裡——那是必須在烏托邦熱度消散後，才能真正展開的行動。於焉，當劉書寫陳世驥，其實遲來地承接了恩師的教義，以抒情作為方法，解構革命意識型態的神話。

除了明指為懺情之作的〈清秀可喜〉，劉後期的數篇小說細細讀來，也疊印陳世驥的身影。那經常藏綴在他對旅美華裔學者的描寫中：例如〈草原狼〉（1984）臥底的「教授」，¹¹⁰籍貫河北，赴美時年 36 歲，與陳世驥相符；〈閒之三：藕斷絲連〉（2012），¹¹¹浦老在美主持漢學研究項目，面臨美國漢學家中文能力欠佳的問題，¹¹²浦老的恩師在國共內戰期間，說服校方在廣州撥款運輸文物一事，則見於〈六松山莊〉的記載。¹¹³

然而，關於陳世驥的線索，總隱晦地藏匿在文本中，僅擷取部分經歷、特質，化為故事的分支。如果寫作提供主體情感抒發的途徑，當劉以書寫再現恩師，面對的卻是雙重的抒情困局：那既是「情迷中國」的幻滅之痛，也連動昔時倫理學的失足，使劉不得不將書寫節制於極為壓抑的篇幅中——這是從革命的不義，抵達抒情的不義了。

相較於劉的描寫，郭松棻後期作品對陳世驥的再現更為迂迴、曲折。郭松棻手稿中，存有題為〈保鈞回憶錄〉的未完稿，僅見兩行筆記：「直到那一天（第一章第一節述陳世驥夫婦送雞湯）我一直是憑窗期待稀奇的事變在某處發生的少年。（三島：《太陽與鐵》，頁 40）」¹¹⁴

109 劉大任，〈六松山莊〉，頁 44。

110 劉大任，〈草原狼〉，《殘照》，頁 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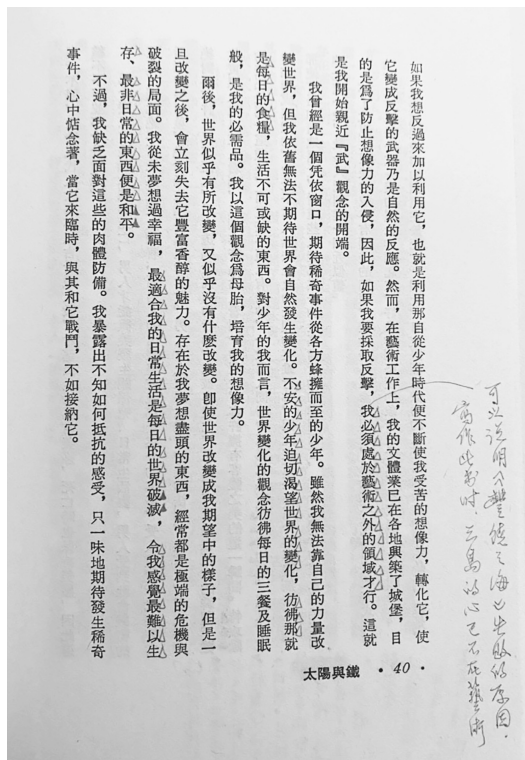
111 劉大任，〈閒之三：藕斷絲連〉，《枯山水》（新北：印刻文學生活，2012），頁 207-208。

112 這在夏氏兄弟的通信中多有所載，例如王洞主編，《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卷四（1959-1962）》，頁 423、600。

113 陳世驥曾於 1949 年籌集資金，派遣人員前往北京、上海、廣州，搜購典籍文物和書報雜誌。劉大任，〈六松山莊〉，頁 37-38。

114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郭松棻手稿，檔案典藏號：ntul_mf0044_151_07-0003（〈保鈞回憶錄〉）。

郭計畫第一章第一節以「陳世驥夫婦送雞湯」的事件作為開頭，並聯繫到三島由紀夫《太陽與鐵》第40頁的描述。《太陽與鐵》該頁內容，回溯敘事者年少時期待世界有所改變，內心騷動不安的狀態，以下是郭在該頁留下的劃記批註：



圖二 郭松棻於三島由紀夫《太陽與鐵》之劃記批註¹¹⁵

依據《太陽與鐵》的線索，可推測在郭的構思中，主人翁為一名革命前夕期待變局的青年。陳世驥夫婦與這名青年的互動，以體現傳統人情倫理的「送雞湯」之舉為象徵，構成與稍後的「事變」性質對立的存在。¹¹⁶ 這篇

115 (日) 三島由紀夫著，劉華亭譯，《太陽與鐵》(臺北：星光出版社，1986)，頁40。

116 另見拙文，〈隱蔽的七〇年代——郭松棻後期作品中的「保釣敘事」〉，《臺灣文學學報》41(2022.12): 84-85。

未能開展的作品所提供的訊息雖較為簡略，同樣指向郭所面臨的抒情難題。

郭的手稿中還存有中篇小說〈月印〉1994 年的重寫計畫，我認為郭對「佐良春彥」一角的經營，也或多或少投射了他對陳世驥的心緒。

在〈月印〉目前流傳於世，即 1984 年發表的版本中，佐良春彥是第三高女的日籍國文教師，主編《臺灣新文藝》，信守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因反對日本軍國主義遭到撤職，返回北海道的鄉間孤獨終老，兒子則戰死於中國東北。

原稿對佐良先生與學生輩的互動點到即止。重寫的版本，著力刻畫佐良先生於家中舉辦文藝聚會的情形，以及戰事將臨之際，政治思想的扞格，如何造成師生的齟齬。

例如其中一頁手稿，寫到昔日論辯的沸騰，是最為愜意的時光，如今先生的一句話，卻使場面全然安靜下來，學生也漸生反抗之念：

弟子要背叛先生了，然而這是不存在的，因為先生率先就被大時代遺棄了。每當這種時候到來，大家總是低頭寒噤不語，如今已有人盯著先生看了。佐良先生自己是知道的，從周圍年輕人的驚愕到混亂到不滿再到憤怒，可以看到時代（局）的步伐何其迅急，他未嘗沒有在這裡頭衡量著自己的處境。¹¹⁷

另一頁從日籍學生角度出發的描寫，則有更露骨的批判：

如今他可以斷定這位老師已經走到了瘋狂的地步。
這時他作為佐良的學生倒有點替老師感到幾分憐悵，認為先生的不幸與孤立都是自己的剛愎所造成的。

...

這樣一意孤行，專事傷害國體的行為，難道在他的良心並不造成刺痛？¹¹⁸

117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郭松棻手稿，檔案典藏號：ntul_mf0044_102_03-0003（〈月印〉重寫計畫）。

118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郭松棻手稿，檔案典藏號：ntul_mf0044_111_04-0002（〈月印〉重寫計畫）。

這些描寫，在在令人聯想到陳世驥在釣運中被定位的方式。本文並非意指佐良春彥一角，是以陳世驥為原型亦步亦趨建構的人物，但就文藝聚會情形與師生關係轉變的部分來看，一定程度上應是以郭自身從拜師到叛師的心路歷程作為藍本的。

李渝對陳世驥的承衍，則可從抒情話語的發展來觀察。《行動中的藝術家：美術文集》自序〈抒情時刻〉（2009），李渝回顧，2006年在一次文學研討會上，研究生詢問〈夜煦〉中喚回聲樂家記憶的曲名：

我例舉了曾讀過的幾位作者的寫法，說到摧毀後的再生，和「抒情時刻」——the lyric moment。

陳世驥老師說過，中國文學史就是一部抒情傳統。何等廣袤深沉的這傳統，經古今中外多少呈現、研究等而早已釐定場域和定義，提抒情，自然不是什麼新主意新見解。只是三年前那一初春的早晨，當陽光從長窗照進會議室，落在窗前坐著的年輕學生們的髮上，烘托出一頭頭的蓬鬆的暈光時，因一個即時的問和答，本來無心去意識的某種寫作動機，竟變成一個論點，常在思路中出現了。¹¹⁹

當李渝自覺「抒情」，她所指認的話語資源，直指陳世驥〈論中國抒情傳統〉一文的見解。李渝曾自述年少時對古典文學並無興趣，退出保釣後，因教書的需要重新接觸，¹²⁰進而寫下故事新編集《賢明時代》與《紅樓夢》評論集《拾花入夢記——李渝讀紅樓夢》，可謂遙遙接續陳世驥的精神遺澤；另一方面，當中國成為失落的邦土，李渝的認同逐漸與地理實體脫鉤，轉而託付以時間以創作為依歸的「『鄉』在文字中」，¹²¹也不無重蹈陳世驥從文化語境中離散的姿態。

誠如鍾秩維所觀察到的，〈抒情時刻〉標誌了李渝對本真性的渴求，在郭松棻逝世後（2005年），真正逸離啟蒙革命大業，轉向與逝者復

119 李渝，《行動中的藝術家：美術文集》（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9），頁4。

120 周昭翥，〈鄉的方向——李渝和《印刻文學生活誌》編輯部對談〉，頁98。

121 宋雅姿，〈鄉在文字中——專訪李渝〉，收入梅家玲、鍾秩維、楊富閔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18：李渝》，頁128。

合——私領域的抒情渴望。¹²² 此際李渝當已省悟，紅色抒情或許才是對「情」最大的局限；而昔年以左翼律令截然二分的，抒情傳統與情迷中國之「情」，也存在相為引喻的空間。

以上梳理柏克萊保釣作家對陳世驤的再現，如何與他們對運動意識型態和情感美學的反思緊密相繫。在此，本文希望引入另一位作者，以俾更深入探尋陳世驤與保釣的歷史因緣。

如同前述，保釣的意識型態光譜並非定於一尊。陳世驤的學生輩裡不乏立場相異的聲音，其中同屬釣運健將、赫赫知名於文學史，並留下以保釣為題材的小說創作者，尚有中間派的張系國。

張系國於 1966 年進入柏克萊攻讀電腦科學，1969 年起和劉大任等人共同經營留學生社團「大風社」，往來密切。唯釣運爆發後，張系國對激進左傾持保留態度，加之彼時已赴紐約康乃爾大學任教，並未介入柏克萊的保釣行動。¹²³

需要留意的是，我們不宜逕以今日的政治分類學去解讀釣運的路線差異。「中間派」不等同「非／反左翼」——細究張系國的思想同樣帶有左翼色彩，他曾回顧初赴柏克萊階段，每日早起必唱〈國際歌〉，是一生中「最左傾也最有理想的歲月」；¹²⁴ 釣運期間刊於《大風雜誌》的長文〈民族文學是什麼？〉亦透露反帝反殖觀點，呼籲知識分子追步魯迅「肩起黑暗的閘門」；¹²⁵ 張系國更將信念化諸實際行動，1972 年返臺期間積極參與社會服務團，和王曉波、陳鼓應一同走訪烏腳病區、農村和礦災區，促成

122 鍾秩維，〈行動中的藝術家——李渝文學的當代性〉，頁 163。

123 張系國實際參與者為康乃爾大學的保釣組織，曾任康乃爾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對外聯絡人。田文捐贈，〈康乃爾保釣委員會改組公開信〉，《清華大學校史 & 特藏資料》，https://nth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delivery/886UST_NTHU:886UST_NTHU/12367512670006774 (2022.12.4 上網檢索)；劉源俊捐贈，〈科學月刊工作通報 40 期〉，《清華大學校史 & 特藏資料》，https://nth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delivery/886UST_NTHU:886UST_NTHU/12367518370006774，頁 2 (2022.12.4 上網檢索)。

124 張系國，〈地下室裡的國際歌〉，《亂世貝果》(臺北：洪範書店，2010)，頁 136。

125 醒石(張系國)，〈民族文學是什麼？〉，《大風雜誌》3(1971.3): 62-70。

《大學雜誌》開設「社會之窗」專欄等。¹²⁶

追究張系國和劉大任等人彼時意識型態的根本差異，在於他在大方向上認可「左」而非「統」，雖對國民黨持保留態度，整體仍支持革新保臺藍圖。因此，張系國反對戒嚴形勢下過激的政治表達，認為無助於實務改革；對左翼運動弊病的省覺，則促使張系國在思想光譜上由「左」向「中間偏左」偏移，戮力批判激進左翼對個體意志和藝術自主性的抹消。¹²⁷張系國並於1971年9月在紐約另辦刊物《野草》，旨在維護對運動提出異議的空間。

在這樣的背景下，張系國觀看釣運乃至陳世驥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方式，遂與劉大任等人形成鮮明的對照。張系國一共寫過三篇以保釣為主題的小說：〈割禮〉（1971）、〈紅孩兒〉（1972）、¹²⁸《昨日之怒》（1978），在〈割禮〉和《昨日之怒》中，均能窺見陳世驥的身影。相較於劉大任等人的隱晦勾勒，張系國的書寫，為陳世驥留下相對豐滿的形象刻畫。

〈割禮〉發表於1971年5月的《純文學》，由看似「反保釣人士」的視角展開敘事。主人翁宋大端為外省第一代學者，時任美國西南大學政治系系主任，忙於籌設東南亞研究中心。宋大端的學術事業一帆風順，但在其指導的研究生林友庚眼中，宋大端已是一名暮氣沉沉的老人。

126 春雷系列編輯委員會編，《崢嶸歲月·壯志未酬：保釣運動四十周年紀念專輯：春雷系列增編》下冊（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10），頁57；王曉波，《良心的挑戰》（臺中：藍燈文化，1980）；謝小苓、劉容生、王智明編，《啟蒙·狂飆·反思——保釣運動四十年》（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頁152。直到2009年，張系國仍表明對左翼信念的認同：「如果問我，一旦世界性的左翼運動再度興起，會不會同樣熱心支持？我想我的答覆還是肯定的。」張系國，〈地下室裡的國際歌〉，頁137。

127 這很清楚地見於〈民族文學是什麼？〉對「民族文學」與「革命文學」的分殊，在張系國看來，二〇年代以郭沫若為代表的革命文學，要求文學服膺政治，魯迅、茅盾對民族文學的倡議，則保持文學的獨立性；此外，由張系國主編的《大風雜誌》在保釣前夕曾刊登魯迅〈文藝與政治的歧途〉一文，文中對革命文學有所批判，張系國選擇刊登此文，不無向日趨激進的左翼同儕「勸諫」之意。醒石（張系國），〈民族文學是什麼？〉：65-66；魯迅，〈文藝與政治的歧途〉，《大風雜誌》2(1970.12): 46-48。

128 張系國，〈紅孩兒〉，《遊子魂組曲》（臺北：洪範書店，1989），頁67-84。

小說主軸聚焦於釣運爆發後，林友庚和宋大端對運動的不同態度。林友庚放下學業、積極投入釣運，當他受託邀請宋大端出席保釣座談會，卻遭宋大端拒絕。宋大端反對林友庚參與保釣，提醒他不要為人所利用。

宋大端的角色形塑，無論生平經歷、學術地位或對保釣的反應，在令人聯想到陳世驥。兩人乍看分屬不同意識型態陣營，但〈割禮〉耐人尋味處便在於，這並非一篇單純「反」保釣或「支持」保釣的作品——張系國實欲透過宋大端與林友庚的對照，拉出一道跨世代知識分子感時憂國，以不同方式回應時局的軸線。

文本不斷穿插宋大端的潛意識與回憶。開篇描繪宋大端自噩夢中驚醒，夢境總是無盡的公路，他耽坐車中，不知要前往何方。這樣的敘事暗示讀者，宋大端受困於記憶，現實之於他反而成為恍然的夢影。既然生命早已喪失延續性和整體性，保釣在他眼中，亦終成必告失敗的徒勞之舉。

然而〈割禮〉要說的並不是犬儒主義。宋大端的虛無，源自年少曾經歷戰火的動盪。三〇年代日本占領華北地區，宋大端親眼見證日軍的暴行，於淞滬戰爭之際搭上外國商船離開上海。留美初期，宋大端奉推動民主制度的華盛頓總統為偶像，期盼學成後回國效力，不料國共內戰爆發，只得終老異鄉。

決定留在美國後，宋大端體認到愛國之道必須更加「務實」，轉而以學術研究作為政治行動的替代方案。因此，面對宛若自身翻版的林友庚，宋大端力勸其不要上街遊行。他嘗試說服林友庚，歸化美國並不等於不愛中國，在學術界取得地位，將來方有機會為國效勞。¹²⁹但宋大端的說法或許連自己都難以取信——他長年飽受內心的折磨，泅泳於書海逃避現實，言談間處處強調自身的「中國性」，反覆質問／自問：「愛國誰能說不該呢？」、「但是誰不愛國呢？我們哪一個不想報效國家呢？」¹³⁰

小說結局，林友庚聽從宋大端的建議，為學術前途計，放棄參加遊行。為人師長的責任暫了，宋大端卻黯然想起昔年赴美時，那意氣風發、

129 這可以對照前引楊牧的說法。張系國、楊牧基本上都選擇了這樣的實踐道路。楊牧，〈柏克萊——懷念陳世驥先生〉，頁 280。

130 張系國，〈割禮〉，收入鄭明嫻編，《六十年短篇小說選》（臺北：爾雅出版社，1984），頁 115。

幻想能擋下朝（象徵民主的）華盛頓廣場駛來的所有車輛——如同擋下國家現代化進程中所有黑暗勢力的挑戰——的自己。〈割禮〉結尾所透露的，並非右翼知識分子壓抑革命的喜悅，而是歷史創傷被觸動的失落與感慨。

〈割禮〉發表時間恰恰是陳世驥驟逝的五月。回推張系國寫下本作的時間點，當是其遭受左翼運動者批判最烈之時。黨同伐異的七〇年代，張系國別有用心地從日軍侵華與釣魚臺主權爭議的對照，照見兩代知識分子看似殊途，實則同歸的關懷，嘗試在「革命」與「反革命」的象限間，提取被隱匿的歷史公約數。

長篇小說《昨日之怒》（1978）再度化用陳世驥的形象。小說以陳澤雄赴美參加會議，拜訪老友金理和初聞「保釣」感到好奇，因此展開對釣運歷史的追尋為主軸。陳澤雄先後在加州、紐約、安娜堡見到王亞男、葛日新、施平、林欣等運動健將，拼湊星散的歷史，呈顯保釣世代因釣運覺醒，到事過境遷後人事流轉的刻描。文本中一閃而逝的片段，婉轉延續〈割禮〉的旨趣：

葛日新越說越激昂。「施平，你記得龔教授嗎？這裏歷史系的龔教授請我們去吃過一次飯。他對我們說，二十幾年前，他差一點就回中國去了。北大的聘書已經拿到手，連皮袍都買好，箱子都收拾好，差一點就回去了。可是就差這麼一點。二十幾年後，他還是在這裏，套他自己一句話，靠零賣中國知識換口飯吃。他現在講起來，還不勝唏噓，差一點就回去了。可是差一點有什麼用？差一點就差了幾千里，差了一個國家！那天我聽龔教授這麼講，我真是又可憐他，又瞧不起他。我發誓絕不走他那條路！」

施平也想起那天晚上，龔教授說起中國時，那種落寞而又無奈的神情。施平帶了一張國樂唱片，送給龔教授。龔教授放在唱機裏播出的時候，他那八歲的小兒子也跑來聽，用英文問他爸爸是什麼音樂。

龔教授摸摸兒子的頭，對他們說了一句。

「胡兒初聞漢家聲。」

他們當時大笑不止。施平回想起來，卻悟出那句話的無比淒涼。¹³¹

葛日新是小說中激進左派的代表人物，施平的角色則對位張系國的中間派立場。不同於葛日新對滯美不歸的龔教授語帶批判，施平細細體察龔教授的離散心緒，對其處境懷抱同情。

以劉大任、郭松棻、李渝和中間派的張系國的作品對讀，我們得見他們重寫陳世驤形象的不同側重面。在運動中立場相對溫和的張系國，對歷史抱持較為開放的解釋空間，特別是保釣當下所寫〈割禮〉，體現他對前行世代之為與不為，更具彈性也更幽微的理解。但無論出發點為何，他們對陳世驤的勾描，皆終以「情」為旨歸——懺情、無法懺情，或同情。這樣來看，柏克萊保釣作家在作品中對陳世驤形象的再現，未嘗不是以另一種抒情的技藝，重構了七〇年代的政治／美學命題。¹³²

六、結 論

本文聚焦於旅美學界陳世驤與七〇年代保釣運動的歷史因緣。柏克萊保釣作家留學初期，陳世驤的資源供給，對群體的形構起到催化之效，唯認同的建立，同時標記區別異己的開端。釣運爆發後，陳世驤在報端對釣魚臺問題公開表態，使其淪為運動刊物的批判對象。

細究陳世驤與左翼學生輩的衝突，可凝聚於抒情的兩種政治來理解：陳世驤在 1971 年正式提出「抒情傳統」的時機，適逢釣運的高峰，這使得抒情傳統的倡議，有意無意間提供了極具象徵意義的歷史暗示——透過「創造抒情」，構成「超越革命」的呼召。然而陳世驤向北美學界揚起抒情傳統的旗幟之際，紅色抒情的浪潮已如火如荼地襲捲學生輩的視野，在

131 張系國，《昨日之怒》（臺北：洪範書店，1978），頁 126。

132 可與柏克萊保釣作家對讀的是，楊牧對陳世驤的書寫，則較為單純地勾勒出師長的期許愛護，與學生的尊崇緬懷，而無懺情意味。楊牧對陳世驤的追憶，主要見於楊牧，〈柏克萊——懷念陳世驤先生〉，《楊牧自選集》，頁 269-284；楊牧，〈北方——石湖先生十年祭〉，《搜索者》，頁 157-167；楊牧，〈卜弼德先生〉，《柏克萊精神》（臺北：洪範書店，1984），頁 89-101。

革命的美學範式中，其從前現代中國孵育的抒情想像，遂被視為右翼反動語言來理解，抒情語境所內蘊的感時憂國意涵，也被窄化為以個人本位出發的詩學表達。

不無諷刺的是，運動初期劉大任、郭松棻等人得以義無反顧地投入行動，在一定程度上得力於陳世驥的庇護，其猝逝因而對柏克萊的運動結構造成直接衝擊。陳世驥與保釣的牽繫既如此之深，在柏克萊保釣作家回瞰歷史經驗的過程中，對恩師的形象再造，遂與他們對運動的省思互為表裡。

從拜師到叛師，成就了革命，卻也埋下後半生的漫長追悔。當劉大任、郭松棻書寫陳世驥，他們其實（未盡自覺地）以抒情作為方法，解構昔年的革命神話。唯雙重的情感困局——「情迷中國」的幻滅之痛，連動倫理學的失足，使他們不得不將書寫節制於極為壓抑的篇幅中；而李渝後半生浸淫於古典文學，對陳世驥的承衍，直指〈論中國抒情傳統〉一文的話語資源，告別革命大業，方是自覺「抒情」之始：「抒情傳統」與「情迷中國」之「情」，原來未必壁壘分明。

引入中間派的張系國的作品對讀，得見他們因運動觀點的差異，對陳世驥的形象再現側重面有所不同。唯耐人尋味的是，他們的寫作，皆殊途同歸地對「情」再闡述——無論懺情、無法懺情，或同情。這樣來看，柏克萊保釣作家對陳世驥的重寫，未嘗不可視為以另一種抒情的技藝，對兩種抒情的政治進行重省與應答，為恩師完成遲來的平反。

引用書目

近人論著

- 乙 歙（郭松棻） 1968 〈文學與風土病〉，《大學》1.4(1968.9): 10-11。
一教授 1971 〈悔過書〉，《戰報》2(1971.6): 37。
丁 羊（傅運籌） 1971 〈釣魚台大觀圖〉，《戰報》2(1971.6): 49。
（日）三島由紀夫著，劉華亭譯 1986 《太陽與鐵》，臺北：星光出版社。
王洞主編，季進編注 2019a 《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卷四（1959-1962）》，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王洞主編，季進編注 2019b 《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卷五（1962-1965）》，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王德威 2010 《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課》，北京：三聯書店。
- 王曉波 1980 《良心的挑戰》，臺中：藍燈文化。
- 丘為君等編著 1979 《台灣學生運動（1949-1979）》，臺北：龍田出版。
- 北美洲華文作家協會 2018 《縱橫北美——從花果飄零到落地生根》，臺北：秀威資訊。
- 江 青 2019 〈又見柏克萊〉，《明報月刊》網站，<https://mingpaomonthly.com/article/details/思潮%EF%BC%8E動向/2019-04/1590997546313/> 又見柏克萊（江 %E3%80%80 青）（2022.11.27 上網檢索）
- 李浴洋 2020 〈夏志清的「情迷中國」陳國球訪談（下）〉，「自由微信」網站，<https://freewechat.com/a/MzA5ODMwMTgxOA==/2734699389/1>（2022.5.21 上網檢索）。
- 李 渝 2002 《夏日跼蹐》，臺北：麥田出版。
- 李 渝 2009 《行動中的藝術家：美術文集》，臺北：藝術家出版社。
- 李 渝、簡義明編 2015 《郭松棻文集：保釣卷》，新北：印刻文學。
- 李雲德 1972 《沸騰的群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李 黎 2007 《樂園不下雨》，臺北：印刻出版社。
- 阮毅成遺作 2016 〈中央工作日記（一二一）〉，《傳記文學》109.1(2016.7): 132-141。
- 林國炯等編 2001 《春雷聲聲：保釣運動三十週年文獻選輯》，臺北：人間出版。
- 春雷系列編輯委員會編 2010 《崢嶸歲月·壯志未酬：保釣運動四十週年紀念專輯：春雷系列增編》下冊，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 柯慶明、蕭馳編 2009 《中國抒情傳統的再發現（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馬不食 1971 〈回頭草——調寄滿江紅贈張北海〉，《戰報》2(1971.6): 62。
- 馬逢華 1982 〈夏濟安回憶（中）〉，《傳記文學》40.4(1982.4): 41-48。
- 夏志清 1971 〈悼念陳世驥並試論其治學之成就〉，《傳記文學》19.5(1971.11): 16-23。
- 唐文標 1976 《唐文標碎雜》，臺北：遠景出版社。

- 商 禽 1970 〈六松山莊訪陳世驥教授問中國文學〉，《幼獅文藝》32.6(1970.6): 63-80。
- 張系國 1978 《昨日之怒》，臺北：洪範書店。
- 張系國 1989 《遊子魂組曲》，臺北：洪範書店。
- 張系國 2010 《亂世貝果》，臺北：洪範書店。
- 張系國 2012 〈我為什麼編域外集〉，《文訊》316(2012.2): 83-85。
- 張研田 1974 〈卅年往事憶世驥（之二）〉，《傳記文學》25.1(1974.7): 29-34。
- 張研田 1975 〈陳世驥與司卡拉匹諾——跋司卡拉匹諾：陳世驥先生事略〉，《幼獅月刊》41.1(1975.1): 42-43。
- 張暉編 2015 《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陳世驥古典文學論集》，北京：三聯書店。
- 張 楊 2015 〈亞洲基金會：香港中文大學創建背後的美國推手〉，《當代中國史研究》22.2(2015.2): 91-128。
- 梅家玲、鍾秩維、楊富閔編選 2019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18：李渝》，臺南：臺灣文學館。
- 莊信正 2014 〈追憶陳世驥〉，《中國時報》2014.1.31，A13 版。
- 郭松年著，許倍榕、曾巧芸執筆 2018 《望鄉：父親郭雪湖的藝術生涯》，臺北：馬可李羅文化。
- 陳世驥 1971 〈夏濟安選集序〉，《傳記文學》18.4(1971.4): 89-93。
- 陳世驥 1972 《陳世驥文存》，臺北：志文出版社。
- 陳國球 2008 〈「抒情傳統論」以前——陳世驥早期文學論初探〉，《淡江中文學報》18(2008.6): 225-251。
- 陳國球 2011 〈陳世驥論中國文學——通往「抒情傳統論」之路〉，《漢學研究》29.2(2011.6): 225-244。
- 陳國球 2013 《抒情中國論》，香港：三聯書店。
- 陳國球、王德威編 2014 《抒情之現代性：「抒情傳統」論述與中國文學研究》，北京：三聯書店。
- 陳國球 2021 《抒情傳統論與中國文學史》，臺北：時報出版公司。
- 黃衍智 2021 〈歷史暴力與抒情的日常——論郭松棻的「詠史」〉，《中國文學研究》51(2021.2): 257-299。
- 黃資婷 2015 〈論李渝小說中憂鬱與抒情之力量〉，收入（美）Robin Visser、樂鋼編，《東亞人文·2015年卷》，臺北：獨立作家，頁 49-90。

- (美) 博客來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 1971 《戰報——廿九示威專號》1(1971.2): 1-2。
- 楊 牧 1977 《楊牧自選集》，臺北：黎明文化。
- 楊 牧 1984 《柏克萊精神》，臺北：洪範書店。
- 楊 牧 1984 《搜索者》，臺北：洪範書店。
- 楊 牧 1986 《文學知識》，臺北：洪範書店。
- 楊 牧 1987 《飛過火山》，臺北：洪範書店。
- 楊 牧 2016 〈翻譯的事〉，《聯合報》2006.12.7，E7 版。
- 楊 婕 2022 〈左翼烏托邦——劉大任「保釣文學」研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42(2022.12): 229-265。
- 楊 婕 2022 〈隱蔽的七〇年代——郭松棻後期作品中的「保釣敘事」〉，《臺灣文學學報》41(2022.12): 63-96。
- 楊 婕 2023 〈典範承繼·多重渡引·烏托邦——李渝的抒情美學與保釣反思〉，《臺灣文學研究學報》37(2023.10): 161-211。
- 楊澤編 1994 《七〇年代——理想繼續燃燒》，臺北：時報文化。
- 楊聯陞 1971 〈追懷石湘——陳世驥選集序〉，《傳記文學》19.6(1971.11): 18-19。
- 舞鶴訪談，李渝整理 2005 〈不為何為誰而寫——在紐約訪談郭松棻〉，《印刻文學生活誌》1.11(2005.7): 38-54。
- 魯迅校錄 1967 《唐宋傳奇集》，香港：新藝出版社。
- 魯 迅 1970 〈文藝與政治的歧途〉，《大風雜誌》2(1970.12): 46-48。
- 魯 迅 1973 《華蓋集續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鄭明嫻編 1984 《六十年短篇小說選》，臺北：爾雅出版社。
- 劉大任 1971 〈反誣讟！反恐嚇！！反迫害！！〉，《戰報》2(1971.6): 14。
- 劉大任 1997 《走出神話國》，臺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
- 劉大任 2000 《我的中國》，臺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
- 劉大任 2002 《紐約眼》，臺北：印刻出版社。
- 劉大任 2007 《晚晴》，臺北：印刻出版社。
- 劉大任 2009 《羊齒》，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
- 劉大任 2009 《殘照》，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
- 劉大任 2011 《閱世如看花》，臺北：洪範書店。

- 劉大任 2012 《枯山水》，新北：印刻文學生活。
- 醒石（張系國） 1971 〈民族文學是什麼？〉，《大風雜誌》3(1971.3): 62-70。
- 盧文婷 2012 「德國浪漫主義與中國文學（從晚清到『五四』）」，湖北：武漢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論文。
- 謝小苓、劉容生、王智明編 2010 《啟蒙·狂飆·反思——保釣運動四十年》，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 鍾秩維 2016 〈行動中的藝術家——李渝文學的當代性〉，收入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所編，《「論寫作：郭松棻與李渝文學研討會」會議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頁 149-169。
- 聶華苓 2000 〈癡情嘆息——讀《應答的鄉岸》隨感〉，《聯合報》2000.1.8，37版。
- 簡義明 2007 「書寫郭松棻：一個沒有位置和定義的寫作者」，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 羅隆邁（郭松棻） 1974 〈談談台灣的文學〉，《抖擻》1(1974.1): 48-56。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郭松棻手稿，檔案典藏號：ntul_mf0044_089_01-0002（〈介紹《沸騰的群山》〉）。
-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郭松棻手稿，檔案典藏號：ntul_mf0044_102_03-0003（〈月印〉重寫計畫）。
-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郭松棻手稿，檔案典藏號：ntul_mf0044_111_04-0002（〈月印〉重寫計畫）。
-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郭松棻手稿，檔案典藏號：ntul_mf0044_151_07-0003（〈保釣回憶錄〉）。
- 〈我旅美教育科學界人士上書蔣總統 強調釣魚台群島為我國領土〉，《中央日報》1971.3.16，2版。
- 〈對釣魚台列嶼主權事 政府採堅定立場 旅美學人表滿意〉，《中央日報》1971.3.21，1版，中央社舊金山十九日專電。
- 深圳報業 2018年重印版《殘照》自序，「浙江新華書店網」，<http://www.zxhsd.com/kgsm/ts/2018/11/09/4242985.shtml>（2022.8.17上網檢索）。
- 〈專訪作家劉大任：「小說要有意義，先回到現實社會裡來」〉，《南方周末》「每日頭條」網站，<https://kknews.cc/zh-tw/news/pgb4vuj.html>（2022.1.7上網檢索）。

- 〈科學月刊工作通報 40 期〉，《清華大學校史 & 特藏資料》，https://nth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delivery/886UST_NTHU:886UST_NTHU/12367518370006774，頁 2（2022.12.4 上網檢索），劉源俊捐贈。
- 〈康乃爾保釣委員會改組公開信〉，《清華大學校史 & 特藏資料》，https://nth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delivery/886UST_NTHU:886UST_NTHU/12367512670006774（2022.12.4 上網檢索），田文捐贈。
- Acton, Harold. *Memoirs of an Aesthete, 1939-1969*.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71.
- [Chen, Shih-Hsiang]. "Polish Literature in China and Mickiewicz as 'Mara Poet'." In *Adam Mickiewicz in World Literature*, edited by Waclaw Lednicki, 569-8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6.
- Chen, Shih-Hsiang. "On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 Opening Address to Panel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AS Meeting, 1971." *Tamkang Review* 2, no. 2/3, no. 1 (October 1971/April 1972): 17-24.

Two Kinds of Lyrical Politics: Chen Shih-Hsiang and the Baodiao Movement

Yang Chieh*

Abstract

Examining Chen Shih-Hsiang's 陳世驥 (1912-1971) role in the "Baodiao Movement" 保釣運動 enables us to observe the multiple entanglements and dialectics among the issues of "lyricism" and "revolution" ("red lyricism" 紅色抒情). Chen proposed a lyrical tradition in 1971, which was at the peak of the Baodiao Movement, and meanwhile, he was engaged in mediating conflicts between left-wing students and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Chen's interactions with Kuo Sung-Fen 郭松棻 (1938-2005) and Liu Daren 劉大任 (1939-), who were not only his students but also movement leaders, had a direct impact on the movement. Chen, like other diaspora intellectuals growing up in the 1930s and 1940s, was an "anti-communist"; yet his political identity was challenged by the leftist ideology of the Baodiao Movement. From this perspective, Chen's "creation of lyricism" in the 1970s inadvertently constituted a call to "transcend the revolution," which conflicted with the connotation of the "obsession with China," another kind of lyrical politics adhered to by his students. Because of his deep connection with revolutionary ethics, Chen's figure is also reflected in the literary writings of the Baodiao Movement, as another lyrical technique to vindicate his sacrifice.

Keywords: Chen Shih-hsiang 陳世驥, writers of the Baodiao Movement 保釣運動 generation, lyrical tradition, revolution, red lyricism, *hongse shuqing* 紅色抒情, Kuo Sung-Fen 郭松棻, Liu Daren 劉大任, Shi-Kuo Chang 張系國

* Yang Chieh, PhD,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